



嚴禁非法秘密監察 確保市民私隱等權利

中國社會問題日益惡化的禍根

打敗帝國主義的反革命運動!保衛、擴展1949年革命的成果!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大會宣言

拉美社會進步特輯

“將石油、天然氣國有化是我們首項的任務”
——訪問玻利維亞新當選總統埃沃·莫拉萊斯
玻利瓦爾革命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可能嗎？
薩巴達革命份子的政治轉變：向前走了一步
巴西局勢與新左派

嚴禁非法秘密監察

確保市民私隱等權利

振言

高等法院裁決，特首曾蔭權去年簽發行政命令，規管執法人員進行秘密監察，不足以作為執法人員進行秘密監察的法理基礎，故判提出司法覆核的梁國雄及古思堯勝訴。法庭同時裁定，《通訊條例》准許特首指示執法人員「勾線」是違反《基本法》。但高院為免判決會造成法律真空，罕有地將判決暫緩6個月生效，讓政府及立法會及時立法。

上述的裁定是前後矛盾的，既然已認定特首的行政命令並非法律條文，不能成為「法律程序」，讓執法人員可以合法地秘密監察，但又容許它再執行半年。而且這也是無必要的，因為只要特首立即簽署實施《截取通訊條例》，就可以解決法律真空問題。

45條關注組成員湯家驊批評，夏正民的決定難以令人信服。暫緩執行判令等如令違法的秘密監察行為變成符合《基本法》，他質疑法官是否有權作出命令。另一名資深大律師余若薇亦指，既然法院已經裁定行政命令不足以令秘密監察變成合法，她質疑夏正民還是否有權暫緩執行判決。

因此，「長毛」梁國雄及四五行動成員古思堯，雖獲判司法覆核勝訴，但不滿法院以防止法律真空為理由，暫緩執行判令六個月，認為做法有違《基本法》，梁國雄已往高院就《執法（秘密監察程序）命令》的裁決提出上訴。而這樣的延長生效判決，只能是幫助政府找尋借口去從事倒行逆施，重演法律法庭為統治者服務的基本功用。

特區政府跟著很快便推出《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交立法會「蓋章」通過，以便「依法執行」。由於立法會內「保皇黨」、保守派佔有多數票，最終得到通過是很可能的，儘管這個草案本身含有許多令人質疑和不滿的地方。例如，草案建議：

1. 特首將依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推薦，委任3至6名高院法官，處理執行機構的申請，這樣拒絕將授權責任完全交由法院處理，將會產生影響授權的獨立性。
2. 設「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處理市民投訴，並就賠償作出裁決；卻拒絕設立通知機制，於事後通知曾受秘密監察的當事人，這對市民很不公平。
3. 草案不適用於非政府團體或人士，亦不適用於國家，及不適用於內地公安，這即是說，有內地國安人員在港非法竊聽偷錄，秘密監察市民，港府也不理，不立法加以防止，等於助紂為虐。

而在討論該條例草案的有關委員會會議上，多位議員關注，若內地或海外政府以威脅公共安全為理由，要求港府秘密監察在港商議在內地或海外策動激進行動的人士，議員擔心政府會濫用公共安全借口，以達至政治目的，他們強烈要求政府應釐清公共安全的定義。但出席的保安局

官員卻答覆說，「很難清楚界定」。這就難以防止執法人員的濫用，令遊行示威也可能被列為危害公共安全而受阻撓。因此應該仿效部份西方國家那樣，將合法遊行不列入影響公共安全範圍內，而且把豁免政治的及工會的集會列入。

此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吳斌建議，當局應強制執法機構要事先申請簽發器材手令，才能取得截取通訊的器材和相關資料，防止有人利用監察器材非法收集個人資料。

從以上指出的各種事例來看，草案確存有許多問題，必須加以釐清和改正。另一方面，改革委員會日前發表《私隱權：規管秘密監察》報告書，建議立法制訂兩項新的刑事罪行，禁止侵入私人處所偷取個人資料，以及禁止使用加強感應的器材偷錄或偷拍私人處所內的情況。

這個保障個人私隱權的取向，在現時有關秘密監察的爭議中提出規管建議，原本是好事；但必須防止影響到新聞採訪和出版言論等自由，以及公眾的知情權。而規定作出報道的傳媒和記者等要負刑事罪行責任，而不是採民事索償途徑追究，那是不公允的。

當然，以上的問題，與當局及其執法人員之違法截取市民通訊是大為不同的，當局新提出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只建議，若執法人員有違反時會受到紀律處分，那未免太輕，且可能會「官官相護」，敷衍了事。因此，有關條例須規定執法人員應負上法律責任，甚至刑事責任，這是必要的。

「長毛」梁國雄和古思堯已針對高院將法例延長半年有效期的裁定向上訴庭申請覆核，甚至要提到終審法院裁決，這種態度是嚴肅、負責的，香港社會絕不容許任何非法的、或利用法律漏洞的秘密監察！

事實上，梁國雄及許多不同政見者和進步的社會活動家，長期來都受到各個統治者的秘密監察、竊聽偷錄，喪失各種應有權利，成為被迫害、被壓迫者。即使在梁國雄、李柱銘、鄭經翰等立法會議員的辦事處和家中的電話，在裝上偵測竊聽器後，都明確發現遭人竊聽。其餘的被竊聽者或者因沒有安裝偵測竊聽器，或者還沒有公開向社會控訴，不知還有多少受害人。這種無法無天、任意踐踏公民基本私隱權利的行徑，在專制統治下固然普遍存在，由來已久，但在21世紀已趕走了英帝勢力的香港，卻仍然如此猖獗，真令人無法相信，然而這些都是事實！

在港人（尤其是法律界、立法會民主派、輿論）的批評、壓力下，港府有可能作出些微讓步，略為修改草案，以冀獲得通過。因此，港人必須發揮更大作用，爭取有效地防止任意的截聽和秘密監察，以確保市民的私隱、言論、遊行示威和政治活動等自由權利！

2006年4月27日

(轉載) 『社會民主連線』籌委會宣言 (討論稿)

一．

回歸以來，香港面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挑戰和衝擊十分嚴峻。

政治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人大釋法」不但扭曲了〈基本法〉，戕害了法治，更令「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成為泡影。民主、人權毫無寸進，「行政主導」的政府更加擅專，言論自由的空間愈見收縮。

經濟方面，九七金融風暴突顯香港經濟空洞化及泡沫化的結構性危機不但未見消弭，而特區政府的經濟、財金政策更向財閥、財團傾斜，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化暗為明，其結果就是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經濟不平等，競爭不自由，不但貧富懸殊加劇，更有「富富」懸殊。

社會方面，殖民地時代的社會不公延續，低下階層生活艱困，弱勢族群尊嚴掃地。更加不堪的是，中產階級不斷分化，社會安定的主流力量互相排斥。

二．

面對當前困局，我們認為首先要改善低下階層的生活質素。只有在不同的公共政策的層面進行財富再分配，將公用事業、社會服務和基本建設全部或部份由公眾擁有，使之成為社會產業，根絕財閥、財團藉著壟斷牟取暴利；以及實行稅制改革，才可消除經濟不平等、競爭不自由、社會不公平的深層矛盾，令香港成為民主、公義、均富的社會。

其次，民主的真諦，是人民決定自己的幸福，人民透過政治參與，直接或間接有份制訂公共政策，實現自治，才能保證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不受剝奪。

三．

與董建華一樣，曾蔭權的權力來源是北京中央政府，所以他也一樣要「仰體上意」，雖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亦要披上「以民為本」的畫皮。但是行政長官如果不是由普選產生，則「以民為本」只會淪為空話。我們堅決反對「小圈子」選舉，繼續積極爭取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區議會成員全部直選。

不過，民主不僅是一個產生政府的方法、一種社會運作模式，一個解決社會矛盾及衝突的機制，而且是人民的生活態度及方式。因此，讓市民大眾在攸關生存絕續的重大議題上有全民投票的權利，也是我們積極爭取的目標。

此外，要讓「社會民主」開花結果，必須在建制外組織自力救濟的抗爭力量，制衡及監察政府和議會的運作。

四．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最近在美國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旨哉斯言！然而，中共「一黨專政」是民主政治發展的最大障礙；中國人民一日未能當家作主，香港民主事業亦難竟全功。兩地唇齒相依，作為中國公民，我們不能獨善其身，必須與十三億同胞休戚與共，為實現中國的政治民主和社會平等努力奮鬥。

民主是時代的潮流，人民的需要；中國目前面對政治、經濟及社會深層矛盾的問題，必須透過建構一個開明、公平的政治參與制度，才能獲得真正解決。

1989年春夏之交神州巨變，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以血腥鎮壓告終；十七年來，我們身在相對自由的國度，基於良知，不敢忘記。

我們深信，中共終將要公布「六四慘案」真相，追究責任，並且對「六四慘案」受難者家屬提供賠償。這是歷史的鐵律，時代的巨潮，不可反動，無人可以逆轉！

五．

台灣海峽兩岸的分治已逾半個世紀，由對抗到和解，由和解到合作，是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任何政治力量的干預都屬徒勞。

我們認為，統一手段，兩岸人民的福祉才是目的；我們贊成「和平統一」，但必須建構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基礎上。

六．

民主就要是有反對的自由！

面對「行政主導」的擅專政府，「社會民主連線」就是旗幟鮮明的反對派！

建設公平及民主的社會，關鍵在於推動民眾參與抗爭，投身社會改革運動的行列，參與議會選舉祇是變革社會的手段之一，我們將視之為走向群眾、實踐理想的工具，絕不劃地為牢，將之當成與建制妥協分肥的籌碼。

我們是旗幟鮮明的反對派！

我們反對踐踏勞苦大眾的腐朽建制！我們反對財閥壟斷社會資源！人民力量必將茁壯成長，民主公義必如一輪旭日。

2006年5月1日

中國社會問題日益惡化的禍根 軍行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日益擴大推行資本主義，由此造成的不良後果，和人民所遭受的困難，就日益增多、普遍而且嚴重。關於這些，在剛結束的人大、政協兩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許多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的發言中，都比以前有較多的承認（雖然還不是完全的、明確的）。而各地傳媒對這些問題和實況的報道也較多，可幫助外間對這些方面有更多的瞭解（包括對中共推行資本主義的各種改革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困難）。

對於中共政策所造成的許多問題，總理溫家寶言不由衷向人民彷彿表示歉意地宣稱：「最覺得痛心的是在這三年的工作中，還沒能夠把人民最關心的醫療、上學、住房、安全等各方面問題解決得更好。」他雖然把當前幾個重要問題點出了，但依然認為「還沒有能夠把……各方面問題解決得更好。」這就是說：已經解決得夠好了，但還不是「更好」！而實際上卻是相反，有關各種問題是越來越惡化、嚴重化。

現在，讓我們就這些問題具體來看吧！

看病難和貴

中國實行的市場經濟路線，其中的醫療改革，也是以金錢掛帥，放棄國家應有的責任，財政投入日益不足，促使各醫院以高收費來維持開支，實際上就是把負擔轉嫁在病人肩上；它所推出的「以藥養醫」，實則又是鼓勵醫療機構夥同藥廠藥商抬高藥價，以賣貴藥來牟利，「養」醫院的開支，結果又是大大加重病人的負擔。

從以下的調查結果中，可反映出貴到什麼程度：2005年全國最大暴利的行業中，醫藥業高踞第一位。例如抗生素的出廠價僅為12元，醫院零售價達170元，利潤率高達13倍。「難怪某醫生說，現在醫院就成了暴利的代名詞，而消費者則理所當然地成為『冤大頭』」。^{<1>}

又如，在福建壽寧縣，一支「硫酸軟骨素注射液」在醫院售價28元9角2分人民幣，但在藥品超市卻僅售4角5分，醫院售價高出藥店超過63倍^{<2>}，而且經衛生局調查證實，醫院所標「天價」是合法的。

藥價虛高的總源頭是當局監管不力，這也與官員貪污腐敗有關，政治腐敗連帶產生醫療腐敗。

這些就是現時中國人民「看病難」的多種重要原因，政府對此實不能辭其主要責任。

儘管當局聲稱：國家已連續7年降了17次藥價，但藥商仍有對策，例如降價藥品停產而斷貨了，藥廠把舊藥換個新名字和包裝，再申請註冊，而藥價更可大大提高。

據《文匯報》兩會報道組在3月9日報道：「有調查指出，近年來中國的人均GDP上升了，而公共衛生費用所佔的比重反而持續萎縮，導致個人衛生負擔急劇增加。從1980年至今，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增長了30多倍，城鎮職工的工資增長了20多倍。然而與此同時，到2003年時，在衛生總費用中，個人支出竟增長了122倍以上。」

「看不起病的人也越來越多了。據衛生部的統計資料，全國有48.9%的病患者不去就診，29.6%應當住院的病患者沒有住院。更可怕的是，生一次病往往可以使已經脫貧的農民重新一貧如洗，這樣的情況甚至在相對富裕的城市也無法避免。有關資料顯示，城市貧困戶中有30%是因病致貧。」

「從『看病難』到『因病致貧』，普通百姓的身體健康沒有得到切實的保障。」

在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的衛生總費用是80—90%，美國政府則承擔了45.6%，甚至泰國政府也有56.3%。但是，在（中共誇稱為「社會主義」的）中國，目前有44.8%的城鎮人口和79.1%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大部份人民是自費就醫。（引自06年1月20日《文匯報》韻婷的〈醫德與高藥費的反思〉一文）

上引的《文匯報》兩會報道組還跟著指出：「小病拖，大病挨，要死才往醫院抬。」這句廣為流傳的順口溜，一針見血地道出了農村人口得不到基本醫療保障的淒苦。因而連出席的人大代表宋益喬也說：目前的合作醫療制度，「主要在於政府投入太少，與實際需求相差太大，因此在實際推行過程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陷入了『大病保不住，小病顧不了』的兩難境地。」

在市場化、利潤掛帥的驅動下，各醫院出現了「天價醫藥費」的浪潮。其中被揭發的一宗是：中央電視台11月21日報道一宗駭人聽聞的事件，哈爾濱一癌症病人住院67天竟然花掉550萬元人民幣醫藥費，即平均每天花費超過8萬元。這宗「最昂貴死亡事件」的主角是74歲的翁文輝，他今年（05年）6月1日被送進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心外科重症監護室（ICU），67天後的8月6日凌晨病逝。在事主家屬追究後，院方一負責人還表示，經過明確核查，發現不但沒有多收，還漏收了130多萬元。^{<3>}

與上述的報道一起，還轉引了衛生部長高強的話，批評公立醫院「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公益性質淡薄，不正之風不能從根本上糾正，加重了群眾的醫療負擔。」看病難、看病貴成為民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高強說：「不能把醫療衛生機構變成追求經濟利益的場所。」然而調查顯示，全國超過七成醫院出現過病人及其家屬與醫務人員的糾紛，以及病人拒絕出院和交費。〈4〉

再舉具體的事例看：國家審計署05年公佈的報告指出，抽查的衛生部及北京屬下的10間醫院，在03年虛報藥價和濫收費就多榨了病人2千多萬元。〈5〉

於是，本應有的救死扶危、助人為重的醫德，逐漸被唯利是圖的貪慾所泯沒。這就湧現了許多原可避免發生的悲劇。

其中從近來的報章可見到的事例就有：其一是，中國有900萬人失明，內有600萬本是可以治癒的，例如，白內障原本是最易治好的病患之一，發達國家視白內障造成的失明為「不必要的失明。」祇由於中國當局對此投入及分配的資金和設備缺少等原因，使大多數鄉村病者得不到治療。

其二是，醫院前院長昏倒在門口無醫護人員過問。根據《楚天都市報》10月30日消息：一老人昏倒在黃石市醫院門口，偌大的醫院卻沒有一位醫生主動對其緊急救治。該老人是該院剛退休的老院長。後來由路人報警；民警才揹他入該院醫治。〈6〉《楚天都市報》的記者認為，這事件折射著醫療道德的缺位……更重要的是，它暴露出當前醫療體制的缺陷。

其三是，湖南《瀟湘晨報》報道：13歲的李娜，遭貨車拖行幾十米，重傷送醫院，要37萬元治療。肇事司機只拿出6萬元後就消失了。她的父母耗盡了所有的積蓄，能借錢的地方都去借了，共只籌得17萬元，還需20萬元左右。李娜不忍心看著貧窮的父母為醫藥費而苦惱，寫下遺書託記者交給父母，其中寫道：「爸爸媽媽，家裏已經沒有錢了，你們也不要再為我操心了，就讓我走吧！」她父母要她堅持下去。各間學校的老師、同學們知道後，正為李娜募捐。〈7〉

李娜的不幸遭遇又一次說明了：醫療費是巨大的，病人卻得不到公費醫治，生命全無保障，交通安全幾無人管，平民被車傷後，當局也無援助。而醫院所流行的車禍「見錢先救，沒錢不救」做法，在李娜身上也得到曲折反映，李娜要付出的醫藥費也是天價般的！但造成李娜和其他病人的無比痛苦的，從以上幾宗事例中可以清楚看到，禍根都正正是中共推行的市場經濟路線和許多醫療改革政策措施！

《人民日報》（海外版）在06年1月出版的第一期《醫藥衛生》就以「看病難、看病貴；難題待解」的大標題，整版刊出了「百姓聲音」，同樣反映出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其中幾則的標題是：陝西農民老漢閻樹懷說：「一跤摔沒了好日子」；山東退休教師陳常英提出：「別忘了看不起病的百姓」（說鄉醫院「現在甚至都沒人去」，「現在的問題是許多老百姓就根本看不起病」）；福建白血病患者周愛珍希望：「適當報銷進口藥就好了」（因每個月要付一萬多元的高昂藥費）；遼寧下崗職工徐春梅「希望醫保政策能落實」。對於解決難和貴應從何著手？選出5個讀者的留言是：從管理體制入手；提高醫務人員的素質；遏制不合理的醫療費用；改變醫療資源分佈不均；政府要加大衛生投入（明確指出「當前醫院的市場化和政府的不投入，成為醫院和醫生要增加收入的利益驅動因素」）。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楯則認為：解決中國人看病「難」和「貴」，需要由政府負起積極的責任，建立最低限度的、覆蓋全體國民的、城鄉一體的醫療保障制度。

求學貴和難

與看病貴、看病難幾乎相同的原因，由於中共推行前面指出的路線政策，使學費越來越貴，尤其是越高等的越貴，以致流行著「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學生拖垮全家」的怨憤「順口溜」。全國政協委員孫繼業早前直指高校收費問題嚴重：改革前是免費教育，20年前增加至200元，1995年增加至800元，2005年再增加至5000元，20年間增加25倍。〈8〉

據《明報》駐京記者報道：目前內地有經濟困難的大學生人數在240萬以上，佔總數兩成，而特別困難的學生比例在5%至10%。在城鄉貧富懸殊的二元經濟結構下，供養一個大學生，中等收入農民要吃不喝地工作11年。不少主管官員認為：教育是一種「產業」，要與市場掛鉤；接受高等教育服務的學生是消費者。

2005年底，甘肅省蘭州理工大學貼出公告，勒令超過20名欠交學費的學生停課，校方要求這些學生出外打工掙錢再來上課。省教育廳高教處仍表示：學生拖欠學費已給學校教學造成很大壓力，「停學打工」方法可行。這實在是把政府本應承擔的相當大部份高等教育經費轉嫁給民眾，把教育變成了從民眾口袋裏掏錢的商業，實際上是間接令家長填補了部份官員腐敗浪費的資金來源。通過教育產業化來擴大內需，高昂學費勢必把絕大多數工農子女淘汰出局，嚴重違反社會公正原則。

在學費由1995年起的10年間上升近20倍的同时，中國公共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直徘徊在2.5%至3.5%之間，而世界各國的平均比重在1998年已達到4.8%。教育部負責人曾指出，目前維繫高等教育正常運轉的經費約需4000億，而國家實際投入只有800億，高校現在向銀行借貸的總金額已

經超過1000億，差額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學費來填補。

調查顯示，大學裏農村學生的比例已從以前的六至七成，降到目前的三成左右。〈9〉

而事實上，不單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國家財政支助嚴重不足，在中小學等的財政支助也更為不足。而農村比城市又更少得多。

在農村，上學難的問題尤為嚴重。中共中央黨校04年所做的調查報告批評，教育撥款嚴重不足下，政府還濟富不扶貧，置農村學校於不顧，將大部份教育資源投放在城市重點中、小學。

中央黨校04年在內地16個省市所做的調查發現，內地農村學生輟學問題嚴重，較統計數字高很多。負責調查的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潘雲良指出，部份地區上報的學童輟學數字和實際情況相差很大，以黑龍江省賓縣久太中學為例，上報輟學率僅2%，但實際輟學率卻是8%以上，嚴重了4倍。〈10〉

該報同時還報道了重慶開縣貧困山區的感人事例：有一位小學教師劉念友多年來把薪金大部份幫助貧困學生交學費等，3年前開始，每逢假期都到煤礦挖煤，賺的錢大部份用來幫助幾個學生交學費。這也反映出農村貧困和上學難的嚴重情況。

國家對農村職業教育的投入也同樣嚴重不足。例如，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國家財政投入到中等專業學校的經費，從2001年開始急劇下滑，而投入高等院校、義務教育的經費卻逐年增加。東北師範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調查資料顯示，2004年河南某縣用於職業高中發展經費佔該縣教育總經費的29.1%，山東某縣為15.2%，而吉林兩縣則少於10%，分別為3.3%和8.5%，而且吉林兩縣水平一直在下降。

東北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通過調研發現，8個縣域，除浙江、山東之外，職業教育現有基礎都十分薄弱。國務院「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對職業教育投入100億元，相當於平均每年投入20億支持1,000所職教中心，平均每所職教中心得到中央財政大約200萬元。但以服裝專業為例，一台縫紉設備約40萬元，200萬只夠買5台縫紉設備，這對於目前因歷史欠賬、經費不足等問題困擾的縣域職業教育來說，仍然遠遠不夠。（報道上述消息的3月12日《文匯報》的大標題更稱是「杯水車薪」。）

由上可見，國家撥款嚴重不足，是各種學校被迫要高收學費等的原因，也即是學生上學難的主要禍根。也因如此，身兼兩會代表的北京幾間大學校長呼籲，國家應實踐落空了6年的4%撥款承諾。

當局連低於世界平均標準的承諾也久不兌現，從而造成教育經費的巨大困難，卻以公佈把被迫多收學費的許多校長撤職，這也是找替罪羔羊，轉移社會視線的手法。

當然，除了上述的主因禍根外，在資本主義唯利是圖意識驅動、並在貪污腐敗錢權勾結的政治影

響下，也難免有許多學校、主事人會乘機從高收費亂收費中謀取私利，而不少學生家長的不滿目標也轉移到學校當局身上。

部分因為如此，新華社報道，從2000年開始，教育亂收費成為各類價格舉報之首。去年有關部門共查處教育亂收費舉報超過1.3萬宗，仍居各類價格舉報首位。

住房等生活困難

除了上述的看病貴、上學貴困難外，隨著房地產的價格連年飆升，使老百姓的住房租金也日益昂貴，更加劇了他們的生活困苦。

由於市場經濟的邏輯使然，投資和炒賣房地產成為圖利的捷徑，且使它成為2005年高踞全國九大最獲暴利的行業之一，地方官員協助強迫收地，從中得利，使大量原有住屋的居民被賤價迫遷而受害；地產商在重建後以高價出售，使房地產價格日益飆升，無數市民要捱貴租，從而促使更多人日趨貧困。對於需要買物業自住的市民，也須付出高昂的樓價，付出高額利息。

著名社會學家李培林，就2005年至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進行報告。他說，買房貴、上學貴、看病貴成為新的民生3大問題。由此報告可反映出這3大問題的嚴重程度。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又必然產生通貨膨脹，百物不斷漲價，市民的生活負擔加重。例如，以最近的廣州市來看，根據廣州《信息時報》不久前報道：廣州衣食住行樣樣加價，令低保（最低生活保障，類似香港的綜援）戶生活更加艱難。舉例來看，鄭學登失業後，一家三口的生活依賴政府發放的每月990元低保。說起家庭困境，年過50的鄭先生禁不住淚流滿面。面對陡然增加的交通費（巴士由1元變2元），緩緩上漲的糧食、油料、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支出，每月990元的固定收入，對於這個還需供一個孩子讀大學的家庭而言，是難以應付。廣東省民政廳官員也慨歎，廣州的低保戶...「都在過著跟燈紅酒綠的城市無關的生活」。在白雲區擁有一套約九百呎住宅的林姓夫婦，每月收入接近八千元。但林先生說，兩人每月起碼要二千元支付生活、交通、通訊等費用，剩下的錢用於還按揭，買東西也處於「只選對的、不選貴的」。林先生說：我們現在連孩子也不敢要，其實我們也是窮人。〈11〉

廣州這個全國最繁榮的城市之一的省會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人民生活也可想而知了。

試從「民以食為先」問題來看。國務院扶貧辦公室主任劉堅透露，目前內地貧困農戶和低收入農民的糧食年消費量處於人均150公斤的警戒線上。592個扶貧重點縣中，有332個縣不同程度缺糧，即近1億3千萬人口隨時三餐不繼。

劉堅說，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總數僅次於印度，列世界的第二位。到年底，內地農村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還有2,365萬人，低收入貧困人口還有4,067萬人，而全國的扶貧工作對象有近1億人。

去年，扶貧重點縣農民人均純收入1,723元，僅為全國平均水準的53%（3月26日《新華網》）。

官方的數字已是這樣，實際情況將會更壞，這是過去經驗告訴大眾的。

貧富日益懸殊 引發更多矛盾和鬥爭

以上所指出的各種困難，加上大量的失業，資本金盡量剝削、積聚財富，政府官員壓榨等，勢必加速加劇百姓的貧窮化，使更多人陷入貧困行列中，促進社會日益兩極分化，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對於這個問題，原中華全國總工會總書記、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李永海在接受採訪時指出，「有統計說，2003年，在中國，擁有超過100萬美元金融資產的人有23.6萬。這些人佔有的財富已經超過了9,690億美元。而2003年中國的GDP是1.4萬億美元。這是個驚人的數字。這是《2004年度全球財富報告》上的統計。這個報告的統計不見得非常準確，但貧富差距拉大，中國已成為當今世界上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最快的地區之一，卻是不爭的事實」。^{<12>}

經濟學家吳敬璉半年多前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文警告，中國貧富懸殊嚴重，今後5年內若不採取措施，將惡化至危險水平，引發各種社會不穩定現象。文章又批評相當一部分暴富階層是靠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起家。

文章刊載後，新浪網評論版網民議論紛紛。有網民以親身經歷表明官商勾結的情況十分普遍，無奈地說，「在中國，不靠官商勾結，哪個能富起來？」有網民則認為靠官商勾結致富者「不是部份，而是很多」，「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力」是造成這種情況的禍根。^{<13>}

中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新的統計數據比舊的更為驚人：《中國證券報》引述波士頓諮詢公司（北京）副總裁鄧俊豪指出，在中國，不到0.5%的家庭擁有全國60%以上個人財富。即使在這些富有的群體內部，也有大約70%的財富掌握在資產超過50萬美元的家庭手中。

而在美國，佔人口總數5%的人掌握全國59.2%的財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富人正變得更加富有。^{<14>}

由於市場經濟而加劇的懸殊差距，不僅在個人之間、城與鄉之間、沿海省份與中西部省份之間擴大，而且在城市居民收入之間擴大。據國家發改委日前發佈的數據顯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

只擁有（城市）全部收入的2.75%，僅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擁有收入的4.6%。^{<15>}

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引發了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治安急劇惡化。零點公司最新發佈的一項針對4,128名18—60歲常住居民的調查顯示，內地城鄉居民的社會治安安全感，從2003年開始連續3年呈下降趨勢。安全社會學研究者顏燁認為，目前，農村霸勢力、地痞流氓等社會惡性勢力，在有些地方一度膨脹。另一方面，一些村和鄉鎮的公共機構對農民的非法盤剝現象，再加上市場經濟轉軌條件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這些都導致了農村居民對自己的財產安全更為擔心。^{<16>}

貧窮化擴大，助長一些人或者鋌而走險，淪為盜賊；或者加入黑社會，為非作歹，而不少地方官僚則利用、勾結他們，朋比為奸，助長惡勢力的發展，因而使城鄉的治安大壞，人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都更受威脅。治安形勢的惡劣，從北京公安部在05年11月17日公佈的數字可以看到：05年1至9月份，全國公安機關共接報案4,780萬宗，較去年同期上升逾兩成，即全國每日平均接獲報案17萬宗，顯示治安形勢嚴峻。公安部發言人武和平指出，目前的治安形勢是在持續嚴打高壓狀態下形成的，犯罪正處活躍期，犯案區和犯罪場所不斷由農村移向城鎮，由住宅轉向公共場所，流動人口犯罪增多，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突出。

再從0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向人大會議作的工作報告看：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全年共審結一審刑事案件683,997件，判處罪犯844,717人，分別上升6.17%和10%。依法嚴懲爆炸、故意殺人、搶劫、強姦、綁架、黑社會性質組織等嚴重危害群眾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的犯罪。審結案件238,738件，判處罪犯321,395人。

雖然上引的法院工作報告數字沒有列出黑社會的案件與上年的升降相比較，但中國有關部門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將是黑惡勢力犯罪的高發期。中國政府從2000年開始的打黑除惡工作的力度將繼續加大。官員腐敗與黑惡勢力勾結互動現象嚴重。有資料指出，社會弱勢人群增加，矛盾激化，扶助與關愛缺失，客觀上為黑惡勢力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土壤。^{<17>}

又據新華社旗下《瞭望》周刊最近的調查發現，在黑惡勢力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弱勢社群由「弱」轉「黑」的現象。內地社會學家指出，經濟發展的非均衡化與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帶來了城鄉差別、失業、收入分配差距等問題，弱勢社群愈來愈多，矛盾日漸激化，同時又缺乏社會援助及關注，客觀上為黑惡勢力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空間。

黑社會問題專家，南京大學教授蔡少卿曾估計，內地黑社會成員至少有一百萬人。^{<18>}

黑幫勢力壯大，原因之一是得到部份官員包庇。據公安部警務督察局副局長鄭百尚透露，在內

地部分地區確實存在「警匪勾結」現象，警務督察除了對一般警容警紀進行督察外，有時還直接參與到一些案件偵查過程中。2002年，督查局接到安徽省某縣群眾舉報，稱當地有人結夥欺行霸市，已成為危害一方的黑惡勢力。督察民警於是前往暗訪，發現舉報情況果然屬實。〈19〉

一般民眾抗議社會不公的正確而有效的途徑是集體抗爭，以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2005年發表的《社會藍皮書》顯示，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宗增至6萬宗，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至307萬。剛剛過去的2005年，「群體性事件」更急增至87,000宗。〈20〉

而公安部的統計顯示，2004年內地共發生74,000宗「群體性事件」，較1994年的一萬多宗增加了逾6倍，參與人數多達376萬人次。官方指出，勞資關係、農村徵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重組、移民安置補償等問題，是釀成「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在經濟利益驅使下，不少地方政府在全國各地「圈地」、攔河、「圈水」、「圈油田」等。

受影響的民眾往往只能透過上訪或法律途徑作出申訴，但成效往往甚微。部份人因此抱著「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心態，不少官民衝突因此發生。〈21〉

從上引的逐年大增數字可說明：中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民眾不滿日益加劇，因而不得不聯合起來抗議、鬥爭。

此外，部分民眾對當前許多問題的不滿，也往往利用網上園地來提出。比如，在溫家寶總理記者會開場之前，內地多家官方及商業網站開闢了「我向總理提個問題」的專題討論，民眾反應極為熱烈。據不完全統計，近50萬網民參加了「網上人代會」，留言板上主要圍繞官場腐敗、教育、醫療、「三農」等關乎民生及觸及社會深層矛盾的問題，或針砭或獻策。〈22〉

這種表達方式雖然是較溫和的，但一下子就有這麼多網民發表「針砭」時弊意見，顯示人民對現狀不滿的普遍。

雖然中國經濟連年迅速發展，5年來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5%，05年達到18.23萬億元（人均逾13,000元）；財政收入突破3萬億元，外匯儲備高達8537億美元，超過日本而佔全球第一位；最高領導人更聲稱要「以民為本」，實行「新三民主義」，建設和諧社會，又宣傳要以教育、科技興國；可是，正如以上指出的，中國老百姓的看病、上學、住房等起碼需求，卻因為當局的政策等失誤而陷於越來越難解決的困境，但國家卻不肯負起應負的責任，動用足夠的財力物力去幫助人民解決困難。

面對著人民的各種困難，當局將仍不會改變既定的市場經濟路線和重要具體政策，而最多只會增加一些撥款等，但這樣的小修小補、小恩小惠，正如前面引述的《文匯報》的標題的評語（「杯水車薪」

等），是不能基本上解決民眾那麼多困難的；雖然它對「三農」問題比以前作出多些讓步（例如比預定幾年提前免徵農業稅），但壓在農民肩上的地方許多捐稅重擔，仍難以在實際上解除。

這又一次說明了：造成人民各種困難的禍根，不但在於當局的錯誤路線、政策、措施，而且主要在於制定路線、政策等並確保它們執行的政治體制。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人民的困難，便必須徹底地民主地改革政治體制，而不是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2006年4月21日所宣稱的「穩妥有序地推進政治改革」！

註釋：

<1>06年2月8日《文匯報》根據《中國經濟網》作的報道。

<2>05年12月18日《蘋果日報》轉載《新華網》報道。

<3>、<4>05年12月16日《明報》報道。

<5>3月30日《文匯報》。

<6>05年10月31日《文匯報》。

<7>3月18日《蘋果日報》轉載，再據《文匯報》4月20日的報道，遠至香港的一些學校師生，也捐集了款項送去了給李娜醫治。

<8>3月18日《蘋果日報》。

<9>俱見2月8日《明報》。

<10>05年12月16日《蘋果日報》。

<11>2月25日《蘋果日報》轉載。

<12>3月9日《文匯報》引述《中國青年報》8日的報道。

<13>05年9月20日《明報》。

<14>05年12月15日《明報》。

<15>2月6日《文匯報》。

<16>2月21日《文匯報》。

<17>1月21日《文匯報》。

<18>1月22日《蘋果日報》。

<19>2月15日《文匯報》。

<20>2月10日《明報》。

<21>1月6日《蘋果日報》。

<22>3月16日《蘋果日報》。

中國：打敗帝國主義的反革命運動！

——保衛、擴展一九四九年革命的成果！

支持把斯大林主義官僚層攆下台的工人政治革命！

《工人前鋒報》社論

兆立譯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1949年革命中誕生的。這個革命雖然遭受了極大官僚變態，卻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社會革命。數以億計的農民起義了，奪取了從很早以前他們的祖先即已爲之而遭受殘酷剝削的土地。兇殘的軍閥、吸血的高利貸，窮兇極惡的地主和使人憤怒的資產階級等的統治被摧毀了。

中央計劃和集體化的經濟制度的建立，爲中國之從絕望無助的農民落後性向前進展，在社會進步上作出巨大跳躍，奠定了基礎。革命使中國的婦女，超越了她們先前的、以纏足這種野蠻習俗爲象徵的惡劣地位，大踏步地向前躍進。一個被列強蹂躪、瓜分了達一個世紀之久的民族，終於統一起來，解除了帝國主義的束縛。

然而，1949年革命從開始，就在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統治下被變形了。

中共這個政權代表一個騎在集體化經濟上的民族主義官僚層。與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不同，因爲十月革命是由一個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布爾什維克國際主義的指導下而實現的，中國革命卻是毛澤東的斯大林主義——民族主義的力量所領導的農民游擊戰的結果。毛的政權仿效從蘇聯無產階級篡奪了政治權力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層，也宣揚這樣的徹底反馬克思主義的觀念：社會主義——一個以物質豐裕爲基礎的、無階級、平等的社會——可以在單一國家之內建立起來。在實踐中，“一國社會主義”在中國，就像在斯大林及其繼承者的蘇聯一樣，不但意味著在國際上對工人革命的前景的反對，而且意味著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遷就。

特別是，中國由毛澤東在1970年代初所開始的，再由他的繼任者鄧小平所繼續的與美帝國主義所結合的反蘇聯同盟，促成了蘇聯最終在1991-92年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中的消滅。

這對國際工人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都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失敗。在目前這個蘇聯垮台以後的時期，世界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增加了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壓力。因此五角大廈（美國國防部）一直積極追求有效的、有先發制人能力的核攻擊計劃，以對付中國的小小的核武器庫。這是華盛頓的布殊幫公開聲稱的戰略。

國際共產主義同盟主張無條件地軍事保衛中國變形的工人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攻擊和資本主義反革

命。中國工人階級必須徹底消除斯大林主義官僚層，因爲後者在國際上與帝國主義妥協，而在國內已經嚴重地減弱國有化財產制度。我們主張一個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使政治權力操在工人和農民委員會的手中。中國工人階級所面對的緊要任務是，建立一個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政黨，作爲一個重新鍛造了的第四國際的一部份，來準備、領導這個政治革命，站在勞苦大眾的前列，指導工人們的自發的、地方化的鬥爭朝向政治權力的奪取。

中共正在中國恢復資本主義嗎？

自從鄧小平政權於1990年代初期引進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以來，一股愈來愈有影響力的西方資產階級意見認爲，中國共產黨在緊抓政治權力的同時，正逐漸地在中國恢復資本主義。這個意見在中共於2002年底的第十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上准許資本企業家入黨的時候，被吹噓得很響，傳佈得很廣。“中國背棄了共產主義，參加資本家的長征”，就是西方報紙上一個典型標題，在這裏則是在2002年11月9日的倫敦《衛報》上的標題。

事實上，這次黨大會既沒有在黨的社會成份的性質上（因爲它有六千六百萬名黨員），又沒有在實用的意識形態上，引進了重大改變。根據官方調查，在二百萬私有企業主中，六十萬是黨員，而且是老黨員。他們之中極大多數是黨的管理層老幹部。在過去幾年中，當他們所管理的小型國有企業被私有化時，他們就自己把它們接收過來了。

有些虛假地宣稱自己是托派的團體已經欣然接受現在在西方資產階級圈子中普遍的看法，說在中國的統治者中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以英國爲中心、由塔菲(Peter Taaffe)所領導的派別，在評論中共第十六次黨大會時寫道，“中國正向資本主義全面復辟邁進，但是統治層正試圖逐漸地、用嚴苛的、專制的控制方式去做。”（《Socialist》，2002年11月22日）。

我們在堅稱中國繼續是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時，並不否認或者低估大陸上的新生資本主義企業家和在台灣、香港早已確立的華僑資產階級在中國社會中日漸增大的影響。政府或黨中很多高級官員都有兒子、弟弟、

侄兒(或者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情況中有女婿)是商人。

可是，北京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主體的政治權力仍然是以中國經濟中的核心集體化部份為基礎的。更有甚者，中共政權的經濟政策仍然受到恐懼社會的——特別是工人的——不安的限制，因為這種不安可能會將它推翻。這個情況幾乎在1989年發生。當時以學生為中心的爭取政治自由、反對腐敗的抗議運動引發了工人們的自動參與。眾所週知，這個反叛運動不久以後遭到了效忠政府軍隊的血腥鎮壓。

(像在東歐及前蘇聯一樣，)中國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也會被斯大林主義波拿帕政治體系的突然瓦解和執政的共產黨的政治破碎所伴隨。北京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鼓勵資本主義企業的經濟政策(以及官僚層的正式的意識形態姿態相應的向右移轉)，已經漸增地加強一些社會力量。這些社會力量，當中共不再能夠保持它現有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的時候，就會引起由帝國主義者支持的、公開反革命的各派系各政黨的出現。這個情況可以在已回歸中國、但是有資產階級反對黨存在的香港這個資本家聚居地上清楚地看出。去年夏天，香港的民主黨組織了由華盛頓的布殊政府及其在倫敦的資淺伙伴所公開支持的群眾性反共動員。

郭蘇堅(譯音Guo Sujian)，是一位流亡美國的右翼中國智識份子。他在(2003年8月號的)《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發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中國已變成或者正在快速地變成資本主義的觀點(文章題目是“中國的所有制改革：朝什麼方向走和走多遠？”)。根據一個簡介，郭蘇堅過去是“中共中委會的一位政策分析專家”。考慮到他目前在意識形態上的偏見，他還是把中國經濟中資本主義因素的生長減至最小程度，同時又認為中共最高領導層就歷史的遠景來看，是繼續相信社會主義的。但是，這位極力提倡“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反共份子卻懂得一個基本真理，這個真理是許多左派人士，包括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內都未曾具有的：

“如何在現有的政治體系和結構中將這麼巨大的國有財產私有化是個極大的問題，是在技術上極難做到的。其他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如果共產黨仍舊抓住政權，它的政治體系仍舊不變的話，現在都還沒有一個私有化能搞成功的例子。”〔著重線是原有的〕。

中共領導人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東歐的各“人民民主共和國”和前蘇聯所發生的事故中，得出他們自己的教訓，作出相應的行動。他們也從幾乎要使他們垮台的1989年天安門反叛運動中得出一些教訓。他們所得出的結論是：即使在學術方面，也不能有政治的自由化。在1997年鄧小平去世後繼續他的江澤民政權，卻能夠在一個一向有內爭的斯大林主義執政黨中，阻止任何有組織的派系鬥爭。在今日的中國大陸，似乎沒有比中共領導中心還要右或者還要左的有意義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或環境。

中國斯大林主義最新的幻想

中國經濟近來的高增長率——尤其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一般化經濟衰退之中——已在中共領導層、中共幹部和與中共有關係的智識份子中間產生了一些趾高氣揚的心態。可是人們在從數以百萬計被國有企業解僱的工人、鄉下來的窮苦的流動工人和在小塊土地上用簡陋的農具勞作以勉強度日的貧農中間，自然會感到非常不同的心態。但是在具有主流政治觀點的中國智識份子中間，人們漸多地聽到這樣的說法，那就是他們的國家已經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無政府性和舊式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的僵硬性之間不知怎麼地找到了一條中間道路。

江澤民、胡錦濤等人在較年輕的時候，無疑地贊同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單以自己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的信條。他們現在認為那個觀點是“教條主義的想法”，認為他們自己是以頭腦清醒的態度依照實際情況來面對和應付世界其他地方。可是，江、胡及他們的追隨者卻被超出了毛主席最狂暴的想像力的妄自尊大所推動。

中共目前的領導人相信他們可以使中國現代化，而且可以通過與世界資本主義更大的融合，把中國轉變為世界的一大強國——也就是廿一世紀的世界超級大國。他們真正地相信他們可以控制、操縱花旗銀行集團、德意志銀行和東京三菱銀行來幫忙建設中國以致它在一代或兩代以後就會超過美國、德國和日本。其實，他們絕不是正在把中國轉變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他們在實際上正在替中國倒回革命前受帝國主義百般欺壓的時代鋪下道路。

自從蘇聯崩潰以後，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敵對態度的增長，就足以證明世界各國資產階級決不贊同北京官僚層要使中國成為強權的野心。在過去十年中，五角大廈〔美國國防部〕為了大力推進“戰區導彈防禦”計劃，已將它的很大部份的軍力重新部署在太平洋邊緣地區。由於美國侵入阿富汗和中亞細亞，也由於它重新在菲律賓及其他地區駐紮軍隊，它已在中國周圍大大地加強了軍事上的邪惡行徑。北京之報名參加美國所領頭的“反恐戰爭”，只鼓勵了美帝國主義的反革命活動。中國領導層也參加了反對北朝鮮的核子武器計劃的活動。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叛賣，這種叛賣只會損害中國這個變形工人國家的本身；北朝鮮若發生資本主義反革命，只會使以中國為對象的資本主義復辟勢力增加勇氣。

確實地說來，佔統治地位的中國斯大林主義者並沒有對美國的軍事包圍苟安漠然：他們在兩年前對華盛頓的間諜飛機的強烈反應就是明証。中央政權也拒绝了美國對北朝鮮這個變形工人國家實施經濟禁運的要求。但是斯大林主義者之以為與帝國主義可以“和平共存”的這個白日夢卻是能使中國群眾放鬆警惕，損害他們對這個工人國家的防護。

防止帝國主義所支持的血腥的反革命的發生，只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革命。過去幾年來，大規模的廣泛的

人民抗議運動和勞工鬥爭時有發生，特別是有關於國有工業企業中大量的解僱的問題。到今天為止，這個政權已通過鎮壓、讓步雙管齊下的手段把這些爭議控制在當地的範圍之內，不使之擴大。儘管如此，歸根究底說來，中國是一個極其不穩定的社會。總有一天，社會緊張狀態的爆破將會粉碎官僚統治層的政治結構。當那種情況發生的時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會面對著以下兩個嚴峻的選擇：以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來開設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或是資本主義的奴役被帝國主義所征服。

那個重大鬥爭的結果，不但對中國的勞動群眾、而且對全世界的勞動群眾將會有決定性的意義。正如蘇聯的反革命的破壞性後果所顯示的，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將會更加鼓舞帝國主義者的勇氣，來猛烈攻擊他們自己國家的工人和其他地方的半殖民地人民。它也會增高各帝國主義之間對於誰來更多地剝削中國發生激烈的競爭，使這個地球更接近帝國主義之間一次新的世界大戰。這就強調顯示國際無產階級有責任站出來保衛中國革命所取得的進展。從另一方面來看，在無產階級的旗幟下所實行的政治革命就真正會震撼世界。

建立在工人和農民委員會的基礎上的政府就會沒收——本土和海外來的——中國資本家和西方、日本投資人所擁有的數以千億美元計的生產性財富不作任何賠償。它也會重新建立中央計劃、中央管理的經濟制度——包括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這樣一種中央計劃和管理的經濟，將不會依據一個封閉的官僚層所任意設想的（曾經產生過像毛澤東的“大躍進”那樣的災禍的）“指令主義”，而建基在最廣闊的無產階級民主上。

這些措施將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引起帝國主義的強烈反對（例如經濟禁運）。但是在國際上，包括在帝國主義的核心地區，他們將會得到工人和被壓迫人民的巨大的同情和團結一致。

由於深深地受到斯大林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教義的影響，即使是思想最左的中國工人也許認為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是非常遙遠或烏托邦的。但是中國若發生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就會打碎自從蘇聯崩潰以來資產階級所散佈的“共產主義已死亡”的意識形態氣氛。它也會使日本這個東亞工業強國的無產階級再度激進化。它會觸發在朝鮮半島——通過在被圍困的北邊的政治革命和在南部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革命統一的鬥爭，而且會在被帝國主義緊縮政策將其財富抽乾的南亞、印尼和菲律賓產生巨大反響。它會使遭受了十年的資本主義窮苦化的俄國勞動工人復蘇起來。

只有通過在國際上，特別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中心推翻了資本主義的階級統治，才能夠實現中國之作爲社會主義亞洲的一部份的全面現代化。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尋求重建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就是爲了向在這些鬥爭的無產階級提供必要的領導層。

中國經濟中的核心集體主義成份

中共領導層正式地把中國〔的經濟制度〕描述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這個“社會主義的”（那就是集體主義的）部份，才造成中國近年來正面的經濟發展：基礎設施投資的擴大（例如城市改建、運河、鐵路和巨大的三峽水壩工程等等），中國之安然渡過1997年至1998年東亞金融/經濟危機和接著而來的一般化全球經濟衰退。而且正是中國經濟中的市場部份引起了負面的發展——貧富差距的日漸擴大，人口中越來越大部份的貧窮化，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國有企業解僱，因無法在鄉村維持生計而流落到城市中的貧困流動民工大軍。

在今日的中國，經濟中的核心集體化部份繼續佔據主宰地位。可是，由於機構安排和政府的政策之間不斷移動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影響，核心集體部份在經濟中的這種主宰地位並不是穩定、前後一致的。在2001年，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合佔57%的全國工業生產總值（〔2002年〕《中國統計年鑑》）。但是這個簡單的統計數字遮蔽了國有企業的戰略中心地位。私有部份（包括外資企業）極大部份是由以勞動密集方法製造輕工業產品的工廠所組成的。重工業、高科技部門、現代軍備生產等極大部份集中在國有企業中。使中國的太空人升空的，就是這些企業。更重要的是，就是國有工業才能夠使中國建立核子武器和長程導彈的軍火庫，防止美帝國主義用核子武器先發制人的威脅。

中國所有的大銀行都是國有的。家庭的儲蓄幾乎全部——估計有一萬億美元——儲存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政府對金融系統的控制，一向是保持和擴張國有工業生產的關鍵，也是促進整個國有部份擴張的關鍵。

從1998年到2001年，政府的支出從12%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20%的國內生產總值。在政府的支出中，最大、最快速增長的部份，是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這個投資在這三年中增高了81%。更有甚者，在中國正有這種生產增長的時候，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包括北美、西歐的最富裕國家在內——一直在進行預算緊縮〔即減少政府的支出〕。爲了灌溉，興築從長江到黃河的運河網〔即“南水北調”工程〕的計劃支出約合590億美元。擴張國有鐵路系統的計劃支出約合420億美元。與前二個數字的總和相比，2002年外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總數是530億美元。

到現在爲止，對金融制度繼續施行國有制，使北京政權有效地（雖然不是完全地）控制著貨幣資本之流進、流出中國大陸。中國的貨幣，人民幣，是不能自由兌換的；它不能（合法地）在國際貨幣市場上交易。人民幣這種受限制的兌換性已使中國避免受到短期資本（所謂“熱錢”）的動盪不安的移動影響。這種熱錢曾經週期性地引起從拉丁美洲到東亞的第三世界新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大混亂。

不僅如此，北京政權在過去一年中，繼續使人民幣的匯率低於“自由市場”的價值，激起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資本家們的極度不滿。像英國這樣第二流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國家，就曾經像現在中國那樣控制它的貨幣在世界市場上的匯價。投機性的貨幣資本曾經在幾個月(如果不是在幾個星期)之內湧入倫敦城(即英國的金融中心)，迫使英鎊不得不升值，不管貝理雅政府願不願意。

世界帝國主義勢力要消滅要拆卸的，正是中國經濟中以上所描述的核心集體主義部份。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中國降低為一個屈服於新殖民主義者的巨大的血汗工廠。華爾街投資銀行Goodman Sachs〔《明報》譯為高盛〕的中國問題“專家”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斷言：“不得不接受的事實是，中國正在變成一個替世界其他地方製造低檔次、勞動密集型的貨物的中心。與大家目前的恐懼剛好相反，世界其他地方卻正在變成一個替中國製造高檔次，資本密集型的貨物的中心”(2003年2月25日倫敦《金融時報》)。高盛投資銀行的這個傢伙，正在這裏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現實為根據，替華爾街設計關於中國前途的計劃。

北京官僚層放棄了國家對對外貿易的嚴格壟斷。可是，這種做法只對華爾街的這種計劃有利。儘管中國經濟近幾年有了快速的增長，它與即使是較小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比較，仍是落後的。北京現在正在大量地進行的建築，你幾乎可以到處看到吊車。但是，一位最近去過中國旅行的同志告訴《工人前鋒報》：“建築工地上的工人隊伍總是很大的，但是，他們所用的工具，除了獨輪手推車和鶴嘴鋤以外，我沒有看到大型掘土機。有一天我在北京郊區還看到大約30人在建造一道3呎高的牆。他們旁邊有一輛馬車，上面裝滿了磚頭。”

雖然中國向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輸出繼續以高速度來增加，這些輸出大部份是以像衣服、玩具和家庭用具那樣的低工資、低價值的輕工業產品和消費品為主的。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從1993年到2002年的增加——從4,800億美元到13,000億美元——幾乎完全被像機械和資本設備那樣的工業產品的總購買量的增加所抵消。

中國的工業，由於它相對低的勞動生產力，是不能夠在世界市場上與美國、日本或歐洲的經濟競爭的。托洛茨基在蘇聯反駁斯大林主義的“一國可建成社會主義”的教條時所寫的話仍然全部適用於今日的中國：

“資本主義世界以它的進出口數字向我們證明，它除了使用軍事干涉的方法以外，還有其他的勸說方法。在一個社會制度的勞動生產力以及整個制度的生產力是由市場上價格之間的相互關係來測量的時候，對蘇維埃的經濟構成也許是最大威脅的，與其說是軍事干涉，不如說是資本主義較便宜的商品的干涉。”——《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28年)

一個孤立的、經濟上相對地落後的工人國家在面對著外來較便宜的貨品時可使用的主要武器，就是國家對對外貿易的壟斷——那就是政府對輸入品和輸出品嚴格管制。但是，解決中國的經濟落後的終極辦法以及到達社會主義社會——那就是無階級、平等的社會——的唯一道路，在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融入國際性的計劃經濟之中。

帝國主義促進資本主義復辟的經濟戰略

讓我們看看世界帝國主義及其中心——美國帝國主義——的代表們和發言人為在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經濟“改革”而提出的綱領。那個綱領是世界銀行在幾年前的一份關於中國的報告中所概括的：“最重要的建議是：政府的角色要從控制者、生產者改變為更能自動制約自動調整的制度的設計師。”

實行這個“建議”首先要做的是，國有銀行停止對老是虧本的國有企業的信用貸款，而且對營利的企業增加較高的利率和較嚴格的還款條件。中國的銀行若實行這樣一個“緊縮銀根”政策，就會把更多的、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趕到街頭。它也會永久地拆卸中國的大部份近代的、資本密集的生產物資工業(例如機械工具、重電氣裝備、農業機械、建築設備等)。

從更基本的角度來看，西方和日本的資本家要以他們自己的銀行來取代中國的國有銀行。開放中國的金融系統、讓外國銀行進來，就會引致大量資金的流出，因為中國的銀行不能夠提供可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獲得的較高利率。大部份在中國產生的經濟剩餘就會被轉移到華爾街、倫敦城、法蘭克福和東京的銀行。這些錢就會被用來購買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公司及政府的有價證券。中國的工人們，和鄉村勞動者們的儲蓄就會真正地替〔美國〕國防部的對準中國的核子導彈幫忙付款！背信棄義的北京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現在就是這樣子——這是一個真正反對中國人民的罪惡——以其巨大的外匯儲備，正在購買美國的短期國債券。而且它已答應以後會多買。

在過去幾年中，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機構，例如國際貨幣基金，曾“建議”中國政府以特別削減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來減少它的預算赤字。這樣一種走向緊縮預算開支的舉動就會破壞中國的勞動者中許多最貧窮、最受壓迫的人們的生計。上海、北京等城市中的建築大都僱用鄉下來的民工。大的內部工程(開鑿運河、鋪鐵路)僱用貧苦農民和村民。更有甚者，削減這些工程就會減慢、翻轉中國的經濟發展。例如擴大中國的鐵路系統，對於在經濟上聯繫較富裕的沿海省份和中國中、西部較落後的區域是絕對必要的。

近幾個月來，美、歐、日的統治圈對中國的經濟要求一直是：人民幣要升值。這樣一個舉動，就會因為中國產品價格的提高而急遽減少中國的輸出品利潤和數量。許多私營，甚至國有的企業都會被迫解僱工人，減少生產，在有些情況中會破產。

在美國、西歐和日本資產階級現行的壓力的背後，卻是一個更基本的方針，那就是對中國的國有金融系統進行攻擊。帝國主義者要強使北京政權讓人民幣可以自由匯兌，以使中國大開門戶，讓華爾街、法蘭克福和東京的銀行可以毫無限制地進行金融滲透。

私有化：外貌與實體

在過去二十年中，不管你是從企業的數目、勞動力或從生產量來測量，大部份國有工業已被私有化了。大多數小企業賣給個人。在這些購買者中，最多的是曾經管理過這些工業的經理。較大一點的企業卻被通過一種分股權的規劃“私有化”了。十多年前，當中國開辦第一個股票市場時，很多西方資產階級傳媒贊美這個做法，說它是確鑿的證明：“共產主義”中國已經決定性地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真正發生了什麼呢？

在中國兩大股票交易所上列出名單的1,240個公司中，有些是由政府持有大多數股份，有些是由政府持有相當大的少數股份。

但是，即使是後一種公司，它仍然在實際上是由政府控制的，因為中共持有政治獨霸權。中國沒有工人民主，中國也沒有股東民主。一位不滿的股東急躁到要組織一個股東大會來推翻現任的經理，就會很快地發現他自己處於很惡劣的地位，因為經理多半是跟政治顯貴人物有關係的中共幹部。

中國的公司的股東沒有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了解的那種所有權。他們有權利從他們的金融資產中得到收入，他們可以賣掉股份。但是他們不能決定或者影響經理部門和公司的政策。這些政策是由各種各樣的、時常互相矛盾的政治和經濟的壓力來決定的。

對這種事實的一個明顯例子是金峰〔譯音Golden Summit〕，金峰是四川樂山的一個製造水泥的公司，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成立，90年代初在上海股票交易所掛牌。這個公司很賺錢。1997年，也擔任樂山的中共黨委的公司總經理辜松〔譯音Gu Song〕利用他的雙重職位，安排高峰公司收購了樂山市內的大肚河鋼鐵廠。大肚河鋼鐵廠是一個正在虧本的國有企業。明顯的是，這種收購，從經濟上看，是不合道理的。那末，為什麼它被收購呢？因為大肚河鋼鐵廠的工人們因工廠拖欠工資，曾發動激烈的抗議。所以中共地方幹部就利用金峰的充裕現款儲備金來抑制當地的勞工騷動。因此，一個影響到公司財政情況的經營決策卻在政治的，不在經濟的基礎上作出。

最近澳洲二位學術的經濟學家所寫的一本關於中國財政結構的書就如此描述股份公司的實在性質：

“中國股票市場的主要問題是：所有權的高度集中在實際上反映國家所有權在許多登記上市交易的公司中的優勢地位。…因此，就絕大多數登記上市交易的公司而言，在市場上爭奪某一公司的控制權的情況是不存在的。就此可以得出結論，不管是來自‘內部的人’或‘外部的人’，經理作錯決定以後只面對著有限的受處罰的威脅。也應該被注意到的是，國家的影響力甚至比佔優勢所有權地位的單位或個人還要大。”(J. Laurenceson and J. Chai, 《Financi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2003年)

此外，中國的股票和公司債券的市場仍然只在金融總資產中佔極小部份，極大部份的金融資產仍是儲存在

國有銀行中。因此，股份公司依靠銀行貸款來提供大部份所需的資金。總而言之，在這兩大股票交易所登記上市交易的公司，大都像它們在完全國有化的時候那樣，保持同樣的經理部門財務安排。

有人也許會很有道理地發問：這種情況今天也許如此，那末明天還會如此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會由政治的控制來決定，不是由對中國股票市場的規章作這個或那個的改變來決定。

2002年夏天，國外投資者首次被容許在中國股票市場上(在嚴格的範圍之內)購買(以人民幣為面值單位)的主要股票〔所謂H股〕。國外的單一投資者不能夠擁有一個公司的超過10%的市值資本，所有國外投資者不能夠總共擁有超過20%。第一個利用這個機會的金融機構是瑞士大投資銀行UBS〔明報簡譯為瑞銀〕。瑞銀購買了中國最大鋼鐵廠寶山鋼鐵公司的股份。

如果瑞銀和其他國外投資者對寶鋼的業績失望了以後怎麼辦？他們可能以虧本價錢賣掉股票。但是，讓我們假設，他們不賣，反而與其他西方銀行投資者聯合起來賄賂中國政府管財政的官員把現任經理趕走，代之以這些銀行所喜愛的經理。西方財團這樣一個在實際上接收中國最大鋼鐵廠的企圖就會是對中共政權政治權威的直接挑戰。中國政府為著保持它的權威，就會不得不處罰受賄賂的官員，並會對國外銀行採取某些懲罰性措施。如果它不這樣做，國有企業和銀行的許多經理就會變成拿帝國主義的金融家、工業家的錢的代理人，政府就會開始失去實行它自己的經濟政策的能力，而中共就會像戈爾巴喬夫時期(1985-91)蘇聯共產黨內部所發生的那樣，開始陷入無節制的派系鬥爭之中。

但是中國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派系內鬥也會開啓了從下面而來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社會力量進行干涉的政治局面。人們可能會見到獨立工會和工廠委員會、左翼團體和政黨的形成。到結果，西方、日本和華僑資本家可能發現他們現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所建立的立足點被無產階級政治革命所破壞、消滅。

中國的銀行制度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制度中主要的結構性變化，是在國有企業的融資方法上。在舊的中央計劃制度下，如果企業的成本超過正常收入，這個企業就會從管理它的政府某一工業部收到不需償還的撥款。同樣地，不需償還的撥款也可用來資助企業生產的擴大，例如更換機器，建築新廠房等等。

在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企業本來應該變成經常賺錢、財政自足的。向外籌措的資金可由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來提供。這貸款到期時本來應該附利息而償還。我們不知道鄧小平及其他早期“改革”設計師是否實際上期望這個制度會依照新經濟信條及伴隨它的政策指導方針去做。我們只知道這個制度週期性地出毛病，不能好好地運轉。

如果所有沒有而且不能償還銀行貸款的企業都關閉的話，中國早就完全變成一個經濟災難區域了。但是那種情況是不容許發生的。所容許發生的是有計劃地、不合適地、隨意地把“壞帳”當作政府的直接財政資助。

銀行向老是虧本和不賺錢的企業貸款，例行地被代之以新貸款或者在不期望真正被償還的情況下被增加。結果中國所有的大銀行，因“壞、呆”帳大過生利的資產，按理說是應該“破產的”。這個情況之所以能維持這麼多年，是因為政府資助銀行，而銀行倒過來資助企業。

因此，在1998年，中央銀行向大商業銀行撥了相等於2,000億美元的巨款來交換它們的“呆壞帳”。這筆企業的債務就被轉移到政府所擁有的資產管理公司。這個公司的責任就是收回(即使是局部的)企業欠款或者把欠債的企業賣給私人。自從那時以來，資產管理公司這兩種工作都沒有做到。

中國金融制度的相對穩定主要是由於以下兩個因素。第一，每個人都知道政府站在銀行的背後。第二，私人的，特別是外國的銀行(還)沒有被允許與它們競爭。

美國大金融信用評價機構穆迪公司去年一份報告作出結論說：“雖然中國銀行制度根據規則來說也許是破產的，充裕水平的流動資產卻能作為這種緊張狀態的緩衝物。強大的存款水平更加反映民眾對國家銀行的信任。”

西方帝國主義的博學的發言人承認，打破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一個必要步驟是金融制度的私有化和特別是國際化。今年初(3月8日)倫敦《經濟學人》——英、美銀行家的一份半官方機關報——寫道：

“所有中國的銀行都是直接或間接由國家經營的，而且政府，不管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干預經理的任命和貸款政策。因此，中國沒有像由市場推動、精英集團管理的銀行這種東西。沒有控制權，外國投資人就會覺得很難創立那一種銀行。可是中國人沒有意思要讓出控制權。”

正如《經濟學人》的抱怨所指出的，外國銀行一直到今天還是被局限在中國金融制度的邊緣，主要是在外貿部份。不用說，國際金融資本一直在想推倒這些局限。例如今年早些時候，華爾街巨頭花旗銀行集團被容許購買中國第九大銀行5%的股權。他們共同發展了信用卡業務，以中國的新富精英——資本企業家、黨和政府高級官員，富裕的小資產階級型(工程師、學術界人士)等——為對象。對花旗而言，這個業務正是它要更深地滲入中國金融制度的一個開路機。花旗銀行集團香港辦事處主任史丹利宣稱：“中國是金融方面最後的大邊遠地區之一。”(《華爾街日報》，9月15日)

江澤民和他的助手們理解到，將中國的金融制度向外國銀行開放就可能會有災難性的經濟後果，尤其會嚴重削弱政府向它的支出提供資金的能力。所以兩年前中國在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中就把金融部門的“自由化”推遲到2006年。中國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才會容許外國銀行與國家銀行平等地競爭。不過，三年以後到底

真正會發生什麼，將不會自動地由世貿組織的協定所定下的時間表來決定。它將會由中國內部的和在中國與資本帝國主義力量之間的社會矛盾來決定。最近幾個月來，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官僚變形工人國家之間的經濟衝突已經變得重要了。

關於人民幣的爭執

中國的貨幣，人民幣，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稱的國際交易的資本帳戶上是不可兌換的。中國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和國有企業經理只有繳了輸入和其他與貿易有關的費用以後(而且經過中央銀行事先的批准)才可以獲得外幣。按照規定，中國大陸的國民需要將所獲得的外幣轉移到中央銀行去兌換成人民幣。

在最近幾年中，非法移進、移出中國的貨幣的數量，真是按照所預測的，大為增加，主要是由或者通過香港的金融商。這些非法流通的貨幣的數量到底有多少現在沒有準確數字，但是它還沒有達到嚴重影響中國經濟或政權的經濟政策的地步。

中國把人民幣按固定比率同美元掛鉤(人民幣於2005年7月21日與美元脫鉤，並升值2%——譯者註)。由於今年(2003年)美元對歐元、日圓和大多數其他貨幣貶值，中國輸出的價格也跟着在世界市場上急劇地降落。這方面的許多專家估計，如果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它就會對美元升值20—40%。

有些美國(以及歐洲、日本)的大資本主義公司也受益於人民幣目前幣值的低估。中國的一半以上經過製造的輸出品是由外國人擁有的工廠或合資企業所製造的。戴爾電腦公司和摩多羅拉都是在中國的十大輸出公司的排名榜上。在太平洋這一邊的巨大廉價零售商店Wal Mart買進了中國輸美10%的商品。

可是，美國製造業資本家的主體相信他們正在受到中國“不公平貿易實施”的傷害。全國產業家協會副主席伐爾果在剛過去的春天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我們必須迫使中國結束對其貨幣的操縱，讓人民幣對美元的兌換率由市場來決定”(《商業週刊》，7月7日)。一個主要是民主黨、也包括一些共和黨的參、眾議員的集團正在推動國會通過一條對來自中國的輸入品強加額外關稅以“抵銷”人民幣價值的低估的法案。更有甚者，國際金融資本的所有巨頭——美國及歐盟的中央銀行主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董事等——都催促北京政權將它的貨幣升值。

但是，中國的領導層還沒有對這個問題讓步。上個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宣佈：“保持人民幣匯價的穩定對中國的經濟表現有幫助，而且符合亞太地區以至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的需要”。

為了在外交上敷衍帝國主義者，胡錦濤答應成立一個小組來“研究”如何在將來使中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將來的什麼時候？以香港為基地的一向消息靈通的期刊《遠東經濟評論》(5月29日)對這個問題如此

寫道：“人民幣在資本帳上是不可自由兌換的。大多數分析家不期望這在幾年內會有什麼變動。他們的恐懼是由於缺乏對銀行制度的信心，太早開放這個國家的資本帳，將會引致大規模的〔資金〕外流”。

但是，即使北京的政策製訂人計劃要將現存的匯率和國際安排維持幾年不變，他們也許不能夠做到這樣子。香港這個資本家集合所是非法的貨幣交易流進、流出中國的一個越來越大的缺口。沒收香港的金融商及其他部份的資產階級的財產，是保護中國的經濟、使之不會受到華爾街、法蘭克福和東京的銀行家破壞性極大的攻擊的一個極其必要的措施。

農業問題再度成為重要

西方資產階級傳媒及學術界對中國的經濟及其所謂“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的討論，通常是以工業和金融為焦點的。可是，在中國的十三億人民中，七億仍然從事農業。1949年革命的主要社會動力是一個巨大、農民反對地主的暴動。很多地主階級份子從他們曾經黯然地壓迫、剝削過的農民那裏得到了應得的懲罰。所有耕地都被國有化了。

鄧小平政權最初的經濟“改革”之一是解散人民公社，每家農戶以長期租用的方式分到他們原先耕種的一塊小田地。但是，土地並沒有重新被私有化，而租約的轉移是有限制的。即使是如此，農戶與農戶之間的競爭必定在農村中產生越來越大的經濟區分。富農階級就這樣興起了。這些富農，通過半合法或非法的安排就能夠剝削比他們窮一點的鄰居的勞動。儘管如此，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結構在基本上而且明顯地是與例如印度的農業經濟不同的。在印度，超過一億的無地農業勞動者在富有地主的大片私有土地上辛苦勞作。

但是，考慮到中國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中國農業經濟目前的結構是不能長久維持的。國有的工業企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政府通過銀行所提供的額外資助來緩解增多的輸入品的競爭。但是中國的小農卻根本沒有辦法與美國及其他大的食物輸出國的資本密集的、科學管理的農業進行競爭。在北京政權已經適時地減低對農業品的關稅和限額的同時，它也訴諸專門安排的保護主義措施。去年它把“安全”規則應用到輸入的基因改造的穀物上。今年，從美國、巴西和阿根廷運來的大豆被暫停卸貨，理由是裡面有真菌（其實中國自己種植的大豆也有這種真菌）。

儘管如此，這個政權的農業政策的基本路線不是保護小農的利益，而是朝向大型的、事實上的私有農場。因此，在10月舉行的中共中全會，通過了一個決議案，更加放寬對農田轉移的限制。一位報導這一次會議的美國記者說：“一位農學家說，‘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擔憂外國來的食品的競爭，而大農場的興起增加農業的效率’”（《華盛頓郵報》，10月15日）。

然而，中共領導層在這方面的決議和意圖並不自動

地、必定地轉移成經濟現實。1949年的革命仍然在中國農村中留下活生生的印象。貧農們知道，他們的祖父母輩懲罰了野蠻的地主階級和貪婪的高利貸者。中國今天的準地主可能會遭受同樣命運。事實上，在過去十年中，我們已經見到中國發生了許多次大規模的農民抗議和騷動，特別是針對增高的稅收和貪污腐敗。

可是，中國必須從小農耕作進展到近代、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一個建基在工人農民會議上的政府不但會禁止或者限制僱傭勞動和將額外的農地租給富農，而且會促進農業的再度集體化。後者並不意味著倒回毛澤東時代的農業公社，因為這些農村的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由以落後方法來耕作的農地所集合起來的。要使中國的農民大眾放棄他們自己的小塊田地而參加集體農場，必須要使他們相信這樣做將會給他們及他們的家庭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一個建基在工人農民會議的政府就會向參加了集體農場的農民徵收較低的稅和提供較廉價的信用貸款。

中國農業合理的集體化和機械化就意味着社會的深刻轉變。向農村引進近代技術——從聯合收割機、化學肥料到整個科學耕種的綜合體——就會需要比現有的在質上更高的工業基礎。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也會反過來增加在城市中極力擴大工業方面的工作職位的需要，以吸收農村中不再需要的剩餘勞動力。明顯的是，這就需要很長的時間，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工業基礎的相對有限的規模和相對低的勞動生產力。這個遠景的步調，以及從最後分析起來，這個遠景的可實現性，將會取決於中國從社會主義的日本或者從社會主義的美國所收到的援助。這就再度著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

工人反叛的幽靈

2000年初，在中國東北老的不景氣的工業地區的楊家莊〔譯音〕鎮的一個大的國有鉬礦公司關閉了。這個礦的幾個還賺錢的部份被私有化——主要是被與現任領導有密切關係的人們接管了。被解僱的礦工在公司辦公大樓門前就微不足道的遣散費而舉行的抗議行動迅速升級為全面發展的工人反叛。二萬多名礦工及其家屬走上街頭，設立路障燒毀汽車而且將油桶點火。

當局謹慎行事，惟恐工人在礦上使用庫存的炸藥來保衛他們自己。工人們與人民武警抗爭了兩日。人民武警是在80年代中特別設立來鎮壓日增的社會不安的一支準軍事力量。最後，軍隊開進來了。他們向抗議者的頭部以上開槍，因此平息了這次反叛。兩年以後中國東北的工人又發動了自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這個國家的最大規模的反叛運動，標誌著即將到來的政治革命。

北京斯大林主義官僚層以它自己的方式承認它正騎在一個社會不安的火山口上。江澤民去年宣佈，“擴大就業和促進再就業，不但是一個大的經濟問題，也是

一個大的政治問題”。可是，江澤民和他的追隨者們不能夠——而且完全不能夠——實現他們自己所定的政策目標。

勞動部部長張左己去年報告，自從1998年以來，在2,300萬名從國有企業下崗的工人中，只有1,700萬名工人已經再就業，而這方面的情況正在快速地惡化。根據政府統計，在2002年上半年間，只有9%下崗工人得到再就業，而在1998年的同時期，卻有50%。在中國的許多城市中，尋求再就業的工人排在路旁，頭頸上掛著指示他們的工作技能的牌子：電工、木匠、鉛管工……。

北京政權尋求減慢失業增長的速度所施用的主要方法，曾經是政府通過越來越大的赤字財政來資助極力在國內各地擴大的公共工程。但是，北京斯大林主義政權在不久的將來必須作出某些困難的選擇。大量增加社會產物中稅收的成份，將需要減少資本主義企業家的利潤和較富裕小資產階級份子的收入。《遠東經濟評論》這份雜誌，極不可能有反對資本主義的看法，但是它在2002年10月10日的另一期上注意到：“沿海經濟充滿活力的私營部份對付稅卻離奇地疏忽”。另一個選擇是：大量減少政府的支出，就需要把更多工人趕上街頭，削減他們的微小的社會福利（例如退休金）。到了那個時候，中共領導層內部的政策分歧與日漸增大的社會緊張狀態交織在一起，可能會開始使官僚層斷裂。

在過去一年中，江澤民政權已被以作為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和作為國家總理的溫家寶為代表的所謂中共的“第四代”領導人所代替。江澤民本人，像他之前的鄧小平一樣，以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這個中國的武裝力量實際的總司令，來保留最終的權威。“第四代”領導人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立場表示他們正受到各種相互矛盾的社會壓力。在一方面，他們更公開地做出親資本主義的舉動（使企業家可以合法地成為黨員，提議把神聖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記載在憲法內）。

在這同時，中共領導層卻採取了一個比年老的、技術專家政治的江政權更“聲稱代表人民的”政治作風。因此，溫家寶在接任總理之前不久，在極冷的冬天，走下了一個煤礦，與礦工們共慶農曆新年。前不久，《中國日報》（10月3日）讚美溫家寶親自幫助流動的建築工人討回拖欠的工資，還評論說：“這件事，證明這樣的事實：當這個新的、接近人民的領導層要處理這個國家的貧困問題的時候，它的地位就確立了。”

這些“親近人民”的姿態還與縮小貧富差距、縮小較富裕的沿海省份與較貧窮的中西部之間的差距等諾言在一起發生。如果這不是空話，而表示在政權之內對於經濟的政策和優先處理次序存在著分歧，那末因此而發生的派系鬥爭就可能開啓新的政治形勢。在那種形勢下，決定的因素將會是中國工人階級及其他勞苦民眾的政治意識以及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那就是列寧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進行干涉來改變、提升那個政治意識的能力。

主張建立工人民主的制度！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及90年代初期，東歐、前蘇聯的許多工人和大多數智識份子抵抗不住西方式資本主義的引進會快速產生西方式生活水平的幻想。但是中國的工人和城市貧民已經體驗到以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外國投資和合資企業的形式出現的大劑量西方（及日本）的資本主義。他們也從日益增多的中國本土和華僑的資本主義剝削者那裏體驗到資本主義。所有這些體驗的總結就是：失業人數大量增加、經濟上的不安全感、社會不平等以及收入的差距。

一切證據顯示，人民對目前在中國存在的這些資本家份子的仇視，是深刻，而且分佈很廣的。人民大學今年初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只有5%的回答者認為新富人是以合法手段獲得他們的財富。去年在中共十六大上為了了解大家的想法而提出的要將“財產權”寫入憲法的建議引起了有點像人民的反衝。在過去幾年中，大量出現了謀殺富豪的事件。

如果說中國工人不大可能對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產生幻想，對西方式“民主”則不同了。當中國的政治局勢逐漸開放的時候，反對共產主義的反革命團體和政黨無疑地就會掩飾他們要推進“自由市場”經濟的本意，來推進“民主”，那就是在一人一選票的基礎上選出的議會政體。這些人物中的一個典型人物就是韓東方這個親帝國主義的“不同政見人士”。他在香港出版一份《中國勞工公報》。他是美國右翼國會議員和反共的勞聯——產聯官僚層的寵愛人物。

議會政體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專政的一個政治形式。在這個政體之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被縮減為支離破碎的個別份子。雖然在這個制度中，工廠的一個工人的選票與工廠的一個經理或技術人員的選票，在點數中，都各是一張票，但是資產階級可以通過它對傳媒的控制、教育制度和其他塑造輿論的機構來有效地操縱全體選民。在所有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政府官員——不管是選出的或非經選舉產生的——都是銀行和大公司所收買的。

正如列寧在他的（1918年11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辯論的文章《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所解釋的：

“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被壓迫群眾隨時隨地都可以碰到這個驚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資本家‘民主’所標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無產者成為僱傭奴隸千百種事實上的限制和詭計。…在資產階級民主下，資本家千方百計地（‘純粹的’民主愈發達，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眾，使他們不能參加管理，不能享受集會、出版自由等等。…勞動群眾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在資產階級民主下，議會任何時候也解決不了極為重大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是股票交易所和銀行）的門徑被千百道牆垣阻隔著，所以工人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覺到，看到和觸到：資產階級的議會是別人的機構…”〔著重處是原有的〕

在資產階級民主下，工人們只幻想著以為對政府有某些控制或權力。但是在工人國家中，工人民主的問題既不是抽象概念，又不是幻覺，而在實際上是一個權力的問題。在像中國這樣一個工人國家中，無產階級專政被斯大林主義者錯誤統治所變形(deformed)——無產階級之作爲一個階級被剝奪了政治權力，而這個政治權力反而被一個反工人階級的官僚階層所壟斷，而這個官僚階層的政策最終會威脅到這個工人國家的生存。工人階級和農村勞動者只能通過一個由以他們自己的階級爲基礎的管理機構即蘇維埃(會議一詞的俄文名稱)所統治的無產階級專政來行使真正的政治權力。這個蘇維埃將會向保衛工人國家的集體化基石的一切政黨開放。列寧在以上所引的同一文章中解釋說：

“蘇維埃是被剝削勞動群眾自己的直接的組織，它便於這些群眾自己用一切可能的辦法來建設國家和管理國家。這裏，恰恰是被剝削勞動者的先鋒隊——城市無產階級具有一種優越條件，就是大企業把他們極好地聯合起來了；他們最容易進行選舉和監督當選人。蘇維埃組織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便於團結在他們的先鋒隊即無產階級的周圍。舊的資產階級機構，即官吏，財富特權，資產階級教育、和聯繫等等特權(資產階級民主愈發達，這些事實上的特權也就愈多種多樣)——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正在消失。…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著重處是原有的〕

中國所面對的抉擇是無產階級政治革命或者血腥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必須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的復辟決不會產生任何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我們可以從蘇聯墮落工人國家和東歐各變形工人國家的反革命的破壞中，看出一點點資本主義到底將會給中國工人什麼東西——自相殘殺的戰爭、貧窮和失業，社會的全面破壞。

在1991年葉利欽發動反革命政變的那段時期，許多葉利欽派“民主人士”之爭辯地說出前蘇聯需要“像〔在1973年在智利發動政變的〕皮諾切特這樣的俄國人”來推行初生的資本主義統治，決不是偶然的。經濟學家波波夫(Gavriil Popov)是葉利欽的一個主要盟友，也是蘇共“民主綱領”派的主要理論家，於1991年當選爲莫斯科市長。他坦白承認，資本主義的引進是不會與資產階級民主相容的：

“現在我們必須創立一個具有各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包括私有財產在內的社會；而且這將是一個經濟上不平等的社會。這將會引致這樣的矛盾：一方面有導向去國有化、私有化和不平等的政策；一方面有爲了達到這些目的而啓動的各種力量的聲稱代表人民的特性。群眾渴望公平和經濟平等。轉變的進程，走得愈遠，這些渴望與經濟現實之間的差距就愈尖銳，愈顯眼”。

1990年8月16日的《紐約書評》上“民主所帶來的危險”一文，甚至在前蘇聯這樣一個全球工業軍事強國之中，各加盟共和國的資本主義政權的性質是多種多樣

的：從半拿破崙主義的“議會”統治到直截了當的獨裁制。資本主義的中國就會使它的人民遭受到更大的社會混亂和更大的貧窮。

更有甚者，舊俄的資產階級之作爲一個階級已經被毀滅了，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只是被革命趕出中國大陸。今天他們仍舊準備要收回失去的財產，並且向富於戰鬥精神的無產階級進行報復。資本主義的復辟可能會使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成爲革命前中國的標誌的軍閥主義再度興起。這不但會導致這個國家屈服於西方和日本的帝國主義，而且被後者所肢解，同時也會使北朝鮮和越南受到重大的破壞。

要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實現蘇維埃民主，需要一個會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推翻資本主義利潤制度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相比之下，在中國實現蘇維埃民主，需要一個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強迫佔統治地位的官僚層放棄政權，使工人、兵士和農民的委員會掌握政權。實行這樣一個政治革命的前提，就是要無條件地保衛作爲工人國家的社會基石的集體化經濟。它(即政治革命)的綱領已被托洛茨基概括在他對斯大林的俄羅斯的古典分析《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一書上：

“它不是以一個統治小圈子代替另一個統治小圈子的問題，而是改變管理這個國家的經濟的方法、改變指導這個國家的文化的方法的問題。官僚的專制統治必須讓位給蘇維埃民主。恢復批評的權利、恢復真正的選舉自由是使這個國家繼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實現這些必要條件的前提是，恢復蘇維埃各政黨的自由活動，首先要從恢復布爾什維克黨開始，以及恢復工會的自由活動。把民主帶進工業中來意味著對計劃作出徹底的修改以至使其符合勞動者的利益。…‘資產階級分配準則’將會被局限在嚴格地必要的範圍之內，而且將隨著社會財富的增長而讓位給社會主義的平等。…青年人將會接受自由呼吸、批評、犯錯誤和成長的機會。科學和藝術將會從一切對它們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最後，外交政策將會回到革命國際主義的傳統。”

爭取工人民主的鬥爭是與擴張革命的鬥爭密不可分的。卡爾·馬克思曾經寫過，隨著短缺，需求被普遍化了，而“隨著需求，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再度開始，而且意味著舊的廢物必會重現”。官僚主義的物質基礎在於短缺——官僚層認爲它自己是短缺的物資如何使用如何分配的裁決人。歷史的必要性再度強烈地提出了革命國際主義的問題。沒有社會主義的美國、社會主義的歐洲、社會主義的日本，中國的工人階級將不能夠消除短缺和需求。其實，中國無產階級的命運——全世界勞動人民和被壓迫者的命運——將會在爲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來決定。

國際共產主義同盟承諾將這個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這個唯一能夠保衛中國抗拒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強大反革命力量的綱領——帶給今日中國的工人和農村勞動者。

2003年11月3日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大會宣言

蔚然譯



2005年11月26-27日在倫敦舉行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 EACL）大會。大會估計了法國和荷蘭公民投票否決了歐盟憲法後出現的形勢，重申在全歐洲組成一個與過去不同的靈活的激進左派是必要的。大會因此加強它的活動能力和透明度，建議在2006年5月在巴黎召開廣泛的研討會作為討論激進左派的論壇。

（1）法國和荷蘭就歐盟憲法舉行公民投票，結果給歐盟的新自由主義計劃一次沉重的打擊。歐盟憲法草案死了，歐盟本身的合法性今天也成了問題。憲法條約原是歐洲中間偏右和中間偏左的政府支持者急於投票通過的新自由主義的議程。

歐盟的建立來自不民主的途徑。它是20世紀50年代為了公司和股票持有者的利益才建立起來的。因此，這一條約為人民所拒絕也就意味著無論是某一國還是整個歐洲，人民都會拒絕新自由主義的議程。我們還認為，採取不擇手段推行自由市場的政策乃是歐洲、美國和中國資本之間的競爭造成的。

所以，我們還看到了私有化計劃對退休金的攻擊，德國、英國和其他國家都提出要提高退休年齡到67歲，並向福利救濟金、醫療和教育大舉進攻。所有這些都點燃了抵抗的火花。例如最近比利時、法國和義大利都發生了抗議示威，義大利的學生還佔領了（學校）。

（2）激進左派還沉浸在最近丹麥和英國大選勝利的喜悅之中，尤其是德國聯邦選舉的勝利。這是德國左翼黨（Left Party）聯合鬥爭的結果。這正是自二

戰以來第一次幾乎是全部左翼政黨廣泛聯合起來支持新左派的結果。這就開創了議會辯論家和非議會辯論家為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協調行動而進行對話。

事情很迫切，因為新政府已經宣佈新的嚴厲而又使人深感痛苦的社會緊縮。德國的左派力量正準備在四月新自由主義政府開始採取行動的同一天，舉行鬥爭反對政府的政策和恫嚇。他們正在籌劃一個廣泛的聯盟反對2007年在德國召開的八大國（G8）峰會，並號召歐洲總動員。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注意到：最有力量和最重要的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分裂意義重大，這標誌著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和進一步向另一不同的左派的建立推進。

（3）歐盟的權力中心決定提前推行他們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他們從老一輩的勞動者的社會利益開刀。我們面對的就是對養老金和企圖提高退休年齡的進攻。

各社會階層同大企業之間最根本最主要的分歧就在服務指令（Services Directive）[同博克斯坦指令（Bolkestein Directive）一樣出名]的問題上。這個指令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歐盟的所有國家中降低工資和減少工作權利。

我們反對分裂和壓制工人的政策。這個政策從東歐招募礦工（Pit Workers）來排擠西歐工人，我們反對種族歧視，迫使某些人進行割頸競爭（Race to bottom）。我們注意到，這個指令來自世界貿易組織和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ATS）的協定，來自2000年提出、2005年修正後歐盟會議同意的、為了新自由主義歐洲的里斯本戰略。我們主張不論來自那一國家的工人，都應享受與本國公民同樣的權利和工資待遇。

我們要討論整個歐洲的工人運動，協調政策和行動，以便在本大陸確保所有工作的最低工資。聯合起來，我們就能獲得勝利；如若分裂，我們就會陷於最糟糕的境地而互相競爭。參加歐洲反對資本主義大會的各組織、各政黨、各社會運動組織都積極行動起來，準備在2006年歐洲議會討論這一計劃時反對服務指令和博克斯坦指令。

（4）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對社會權利的侵犯，其結果是增加失業和貧困，也就是增加不安全和貧窮，特別是在青年與婦女工人之中。正是由於種族歧

視和警員對青年人的挑釁性行爲，貧困而又沒有希望，這就是本月引發巴黎郊區騷亂的社會原因。

法國政府和行政機構對此的唯一答覆就是加強鎮壓，包括引用根據1955年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殖民戰爭時期制定的宣佈國家處於緊急狀態的法律；這個法律允許暫時禁止人民的自由，給予警員和省長有權禁止各種群眾集會和會議，強制實行宵禁。

(5) 對窮人和移民進行攻擊不能解決社會問題。最近幾個月來，我們看到了遠在地中海邊界的軍事區的切烏塔(Ceuta)和梅里拉(Melilla)就發生過衝突，在蘭比杜沙(Lampedusa)、西西里和馬爾他拘捕難民的事，我們拒絕接受將難民驅逐出境，把他們遣送到利比亞的拘留中心去的政策。大多數歐盟國家在911事件後以“反對恐怖主義”爲藉口，通過了反對人民權利的計劃。

最近幾個月來，我們看到了歐洲國家突然間通過法律限制我們的權利，同意中央情報局刑詢迫供和讓美國飛機使用歐盟國家的機場將人質運送到設在東歐的非法拘留中心和巴格蘭姆(Bagram)及關塔那摩去。

我們拒絕接受所謂“文明戰爭”和“伊斯蘭恐怖”作爲政策的依據。我們重申反對戰爭和種族主義；我們贊成保障人權，我們不接受所謂“歐洲堡壘”。

(6)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是反對戰爭和佔領伊拉克及阿富汗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再次重申贊成結束這一佔領和反對帝國主義。我們首先要反對在北約組織保護傘下歐洲國家捲入對阿富汗的佔領。我們再次重申不要北約和任何類似的軍事聯盟的決心。

(7) 全球正義運動是新的全世界抵抗運動的推動力量。這就是我們作爲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的參加者要參加即將在馬里和委內瑞拉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的原因。我們將在這兩地的世界社會論壇中發展我們同其他運動的聯繫，和在非洲、拉丁美洲發展新左派。

我們特別歡迎玻利維亞反對私有化和反對掠奪自然資源，爲了人民的利益實現國有化的勝利；歡迎委內瑞拉革命的發展和巴西新左派的興起，我們也準備參加即將在雅典舉行的歐洲社會論壇和在那裏協調我們的行動。

我們所做的並不僅僅是爲了抵制對我們的權利、我們的狀況和我們的將來的侵犯，而且是爲了幫助另一種社會的發展；這個社會要建立在和平而不要戰爭，團結而不要分裂，平等而不要壓迫，正義而不要剝削的基礎之上。這就是我們建議明年在法國公民投票否決(歐盟憲法)一周年紀念時大家齊集巴黎來討論建立一個正義的歐洲的原因。希望受剝削受壓迫的人都來參加這個研討會。

倫敦 2005年11月28日

丹麥紅綠聯盟(RGA)

法國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CR)

葡萄牙左翼集團(Bloco de Esquerda)

蘇格蘭尊敬聯盟(Respect)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

英格蘭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德國共產黨(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

西班牙另類天地(Espacio Alternativo)

西班牙加泰隆那亞聯合與另類左派

(Esquerra Unida i Alternativa)

瑞士團結(SolidaritéS)

英格蘭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大家都來反對歐盟博克斯坦指令和老板們的進攻！ ——第四國際歐洲各國支部的聯合聲明

蔚然譯

2006年2月14日擬議中的博克斯坦指令（Bolkestein Directive）最終很少修改，便以394票贊成，215票反對，33票棄權通過。該指令以前歐洲單一市場專員弗裏茨·博克斯坦（Frits Bolkestein）命名，旨在開放歐盟各國的服務業市場，促進跨國財團更自由地收購公共部門。歐洲工會聯盟（The 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號召在斯特拉斯堡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運動。第四國際歐洲各支部於法案通過前夕發表如下的聯合聲明：

2月14日擬議中的博克斯坦指令很少修改便在歐盟議會宣讀，這是對歐洲人民的正式挑戰。廣大歐洲人民通過他們的工會和他們的選票，在法國和荷蘭反對和否決了歐盟憲法。這一舉動如此有力，使得希拉克總統答應把這一指令丟進垃圾桶去。

資產階級侵蝕社會利益

這個擬議的指令要在人民中組織社會傾銷和鼓勵競爭。它把公共服務和工資收入者都變成商品。這個建議只代表資本主義歐洲，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這個資本主義歐洲是建立在馬阿斯特裏城和阿姆斯特丹條約的基礎上的。這個建議是老板們和歐洲各國‘左派’的和右派的政府對世界勞動者發動進攻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加劇競爭的全局來看，歐洲資產階級開始侵蝕社會的收益了。歐洲的公共部門到處都在加速私有化，它們的社會政策是損害臨時工、機動工、失業工人和醫療衛生、養老金的政策。為了使這些政策得以通過，到處都集結大批鎮壓的武裝力量，目的就是針對工人、青年和移民的所謂“犯罪”行為。

歐洲人民要求組織統一

只有歐洲勞動人民協調一致的群眾動員才能打退老板們的進攻。撤銷博克斯坦指令應是我們的一致要求，如成功就能給社會運動帶來新的希望。

面對老板們的進攻，通過像佛羅倫斯、巴黎、倫敦和目前在雅典的歐洲社會論壇組織，醞釀著的抵抗網路正在形成之中。抵抗運動在義大利、荷蘭、希臘和比利時的許多城市組織過總罷工，但都失敗了。這說明孤立的罷工今天已不足以向老板們提出更高的要求，並迫使他們退卻。

我們要組建另一種政治架構

妨礙社會運動的一大障礙是缺乏為群眾依賴的政治遠見。當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和綠黨聽從新自由主義的指揮棒行事，其結果是使工人階級只能不情願地在極右派和溫和右派之間進行選擇。資產階級已不再為改良給社會民主黨些少酬勞，卻常常把它和綠黨一起改變成社會自由黨了。但在工會中，在政治的和基層的左翼中的廣大群眾卻不再接受向後倒退。他們正在試圖組成新的力量準備衝破資產階級法律的約束，並依靠社會總動員對深受老板之害的所有各階層人們的要求作出回應。

一個能夠合理分配財富，又能保障工作、文化、健康和環境的社會組織是可以實現的；在這個社會組織中，人民能夠決定生產甚麼和如何進行生產、並經常地進行監督以確保人民的意志的實現。

第四國際的戰士們一致行動起來在歐洲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簽署這一聲明的有：

- 義大利紅旗派 Bandiera Rossa
- 西班牙社會主義出路 Alternativo
- 英國國際社會主義小組 ISG
- 德國國際社會主義左翼 ISL
- 法國革命共產主義同盟 LCR
- 希臘國際共產主義組織 OKDE
- 葡萄牙革命社會主義政治協會 PSR
- 丹麥社會主義工人黨 SAP
- 比利時社會主義工人黨 SAP/POS
- 愛爾蘭社會主義民主 Socialist Democracy
- 荷蘭社會主義政治選擇 SAP
- 巴薩隆那地區全球反抗 Revolta Global
- 瑞典社會主義黨 SP

國際新聞短波

兆立輯譯

第二十二屆國際革命青年夏令營

與第四國際團結一致的青年團體所組織的第二十二屆夏令營於七月最後一個星期在法國西南部巴巴斯特舉行。有四百多個青年積極分子參加。他們主要來自歐洲各地，也包括一個從菲律賓來的青年代表團，以及從南韓、象牙海岸和北非來的個別代表。

他們所討論的題目很廣泛，包括國際局勢的各方面、激進青年的活動、全球正義運動、反戰、反對對教育權的攻擊以及與全世界正在鬥爭中的青年、工人和被壓迫的民族團結一致。

他們所作出的結論很多，包括：參加二〇〇六年在雅典舉行的歐洲社會論壇，協調歐洲各地的學生鬥爭，以及組織一個第四國際青年隊於明年到委內瑞拉學習玻里瓦利革命過程的第一手經驗。

明年的夏令營將由意大利代表團所組織。

蓋洛威就倫敦被炸事件發表的聲明

英國國會議員蓋洛威代表尊敬組織(Respect)就倫敦爆炸事件發表以下聲明：

我們對倫敦爆炸中的死亡者的家庭及所愛的人表示哀悼，我們對受傷者表示衷心的同情。

沒有人會寬恕以終日為生活而忙碌的勞動人民為對象的暴力行為。他們並沒有參與，更沒有直接作出政府的〔派軍隊攻打伊拉克的〕決定。他們是完全無辜的，我們譴責那些殺死或傷害他們的人。不管在這個國家或在伊拉克，無辜人民的生命的損失，正是近幾年來變得越來越不安全越不和平的這個世界的結果。

我們已經不倦地企圖把這種暴力的成因從我們的世界中移除開。與這個國家的保安部門的看法一樣，我們也認為攻佔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會增加恐怖份子要對英國本土發動攻擊的威脅。悲慘的是，倫敦的居民現在竟然替政府之忽視這種警告付出代價。

我們強烈要求我們的政府，像西班牙政府所做的那樣以結束伊拉克的佔領和把它的注意力完全放在真

正解決中東各個較大的衝突上，來使這個國家的人民處於安全的地位。

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世界各地(包括這裏)的人民才能享有安定的生活，不受無必要的暴力的威脅。

地中海社會論壇中的婦女集會

來自(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和意大利的世界婦女行進社的積極份子在地中海社會論壇上召開一個全體婦女大會，專門討論地中海地區的婦女權利問題。

一位伊拉克婦女在會上描述了〔美國侵伊〕戰爭所造成的恐怖情況。她說，不管在〔美國侵伊〕美國兵士所把守的監獄中或者作為性侵犯的受害者，每個人，特別是婦女，都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一位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區擔任心理學家的巴勒斯坦婦女，對於第二次起義之使婦女的處境惡化，作了非常感人的解釋。除了佔領軍的暴力以外，夫妻之間的暴力也正在增加。這是因為男人受到佔領軍的侮辱以後，再加上他們自己的處境(失業和極度窮困)，時常找自己的妻室或其他婦女來出氣。

另外一件要團結起來進行干涉的事情是新自由主義對婦女，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婦女的打擊。這是在教育和健康的領域中主要以婦女為對象的結構調整計劃所產生的有害的結果。

一個全體婦女大會在論壇期間召開了。有數百人參加。如此高的參加人數使召集人驚奇不已。會上所交換的意見非常豐富，有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埃及、巴勒斯坦和突尼斯等國來的婦女討論她們的生活和經驗，有的婦女也討論了有關移民的問題。

論壇根據這些討論起草了一份地中海地區第一次社會論壇的婦女大會的宣言。

“將石油、天然氣國有化是我們首項的任務” ——訪問玻利維亞新當選總統埃沃·莫拉萊斯

赫夫·多·艾濤 (Herve do Altot) 著(1) 秋惜譯

玻利維亞農民與土著領袖、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 (MAS) 主席埃沃·莫拉萊斯，在2005年12月18日總統選舉中大獲全勝之後，20日（星期二）在拉巴斯的選舉總部接受訪問。剛選上的總統談及未來政府所面臨的挑戰，以及近年社會抗爭的核心議題，例如石油、天然氣的國有化、捍衛古柯葉的種植等。

問：根據星期天晚上公佈的選舉結果，你無疑將成為玻利維亞共和國的民選總統，你個人感覺如何？

答：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玻利維亞人民對我有信心，我從未想過會像現在這樣。贏得50%以上的選票是歷史性的，我們在玻利維亞民主的歷史上打破了記錄，再者，能夠代表土著，不只是玻利維亞的土著，還有整個拉丁美洲的土著，使我引以自豪，我希望所有人都會同意。我想證明自己像我們的兄弟那樣有作為。我以那些加入我們陣營的中產階級、所有知識份子，甚至是僱主為豪，同時希望他們也以土著與莫拉萊斯為豪。還有，我希望大家一起合作，改變玻利維亞，想及統一團結、窮人及那些被排斥的人民。

問：你認為甚麼原因使玻利維亞民主的歷史出現前所未有的成功？

答：這是艱苦奮鬥的成果。早上5點，我們便開始準備競選，或者籌劃未來政府運作。我們會繼續和社會運動各界合作，像明天在科恰班巴舉行大型集會，社會運動之間常常有差異，但是必須保持對話與溝通。

社會運動的角色不是對我們發命令。我們經過辯論、協商，然後把大家團結起來。我們感覺是時候改變國家，改變我們的玻利維亞，就像歷史上有影響力的先烈，例如圖帕克·卡塔里 (Tupac Katari)、圖帕克·阿馬魯 (Tupac Amaru) 等爭取Tawantinsuyo〔前哥倫比亞印加共和國〕的土著領袖，還有像西蒙·波利瓦爾 (Simon Bolivar)，爭取建立大拉丁美洲祖國。有著社會運動的支持，我們在政府架構裏繼續鬥爭，我們確實是大多數，在選舉中得票50%以上。

問：人們經常把你和拉丁美洲政治人物像卡斯特羅、查韋斯聯在一塊，那麼你是社會主義者？

答：顯然是對的。社會主義離不開個人的改變。我常常說我們必須改變自己，才能夠去改變玻利維亞。

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意思是不自我中心、不個人主義、不去想甚麼東西是為了我、不做操縱者，還有經常想起玻利維亞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從工會鬥爭的經驗中學到這一切，所以我們也有意去改變爭取社會主義黨。

我們寄望未來實現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組織農民共同體的活動。共產主義從哪裏來？唔，就是從共同體 (communities) 而來！

我住的地方，並沒有私人財產的概念，那裏是農業區，屬於社區的所有人，因此，我們要去接管與鞏固這些集體的、建基於團結的組織模式，才能夠好好共享我們的財富，玻利維亞的財富。

問：關於種植古柯葉，你們政府首先會採取甚麼措施？

答：我們不會完全消除古柯。我們想將合法消費古柯所需要的生產合理化，另一方面，我們一定禁止可卡因和販毒。因此，我特別邀請北美洲政府簽署有效的合約，打擊販毒貿易，這樣意味共同承擔，才能夠控制銀行界和市場。我們不僅需要那處理“供應”的法令1008〔即玻利維亞關於古柯的法律〕，也需要處理“需求”的法令1008。

我們唯有做到沒市場、沒需求、沒吸毒癮君子，才能夠結束販毒貿易。如果古柯葉有非法市場，那麼合法的市場會繼續受到影響。因此，打擊販毒貿易的關鍵之一就是鞏固合法市場。

問：這是否意味種植面積會減少？

答：我們在恰帕里〔科恰班巴附近生產古柯的地區〕的經驗，便是確定種植的面積，即所謂40米 X 40米。這無疑是種植古柯葉的農民運動，對打擊販毒貿易作出最重要的貢獻。

問：將石油、天然氣國有化會是你們政府首項的措施嗎？

答：對，在經濟範疇肯定涉及這個議題。在政治範疇，是優先建立立憲議會，結束玻利維亞一直以來的殖民地位。

問：在國有化的趨勢下，石油公司似乎懼怕激進的政策會針對他們。那些讓他們剝削資源的條件會發生巨大改變嗎？

答：對我們來說，這不是充公或者沒收石油公司的財產。他們不能夠擁有石油、天然氣的所有權，那確實屬於我們的。從今開始，只有我們的政府才能夠行使這項權利。我們將石油、天然氣國有化，而不是石油公司財產。

問：你會怎麼樣為玻利維亞國家恢復所有權？

答：只是依據國家的政治憲法，那憲法一直被踩在腳下。從今開始，無論哪家想投資玻利維亞的石油公司，一定要服從憲法。很多律師確認，現行石油公司和玻利維亞政府簽訂的合約毫無法律約束力的，因為代表大會從未批核過。

任何合約必須經過代表大會批核，才能施行。所以說，這些合約是反憲法的，而且非法執行。從今開始，國家才是石油、天然氣的擁有者，表面上和實際上都是。無論如何，若果石油公司態度負責，我們會給予他們投資的回報，因為邏輯上，任何企業投資都追求利潤。但是，這些利潤必須以公平和透明的方法獲取，而且，第一個受益者必須是國家。

我們不能再容忍國家只賺取18%的石油開採地使用費，而石油公司卻獲得高達80%的暴利。

這必須改變。假如人民投票給國有化、給我，人民的聲音是上帝的聲音，所以我們就要尊重。

問：自從天然氣有了固定的價格，玻利維亞有時候以比市場偏低的價格出售，這是否意味你們政府將會釐定石油、天然氣的最低價格？

答：首先要有國內的市場價格，這是我們優先處理的事情之一。我們必然結束這種狀況，土地下的財富應該由我們自行處理。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燒柴取熱，因此，我們國內市場應該有特價，而且價格不能屈就國際市場的需求。第二，到現時為止，那些買賣合約違反憲法，正是這些合約迫使我們以石油每桶16或17美元出售，而事實上應該是60美元。因此，我們必定廢除這些合約，並且重新簽訂。

問：阿根廷現在付的價格非常偏低，有些鄰國也一樣。如果推行新政策，會有甚麼後果？

答：首先，我們要解決國內供應的問題。一旦解決，我們會優先增加出口，賣給鄰國，我不能說現在的價格應該是多少，無論如何，當我說我們的出口政策必須奉行平等的原則，意思是我們爭取各國平等的關係。那麼，以後不再出現阿根廷Repsol石油公司從玻利維亞的Repsol石油公司購買石油的事情，而一定是有國家主權的玻利維亞政府，把石油賣給阿根廷政府。這是唯一保證由天然氣所創造的財富為大多數人共享的可行的方法，而不是由少數的石油公司壟斷。

問：你當選之後那天，美國發出很冷淡的賀詞，你怎麼看待玻利維亞和美國以後的關係？

答：我們準備好和所有政府對話，包括美國，如果北美洲的政府對我們採取民主的態度，尊重玻利維亞人民的選擇，那麼我們會與他們建立關係，那絕不是那種屈服或者從屬的關係。

我們要的是以解決人民困難為目的的關係，如果布殊政府尊重與捍衛人權，而且打擊貧窮，那就會受到歡迎，我們不會接受勒索或者任何狡猾的交易。

我們並不孤獨。一月我們會出訪外國，首先訪問南非的曼德拉，跟著是巴西的盧拉，此外，與中國政府的會談也擱置了好幾次。

問：現在拉丁美洲兩位政治人物，阿根廷總統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estor Kirchner)和墨西哥總統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似乎把政治局面變得兩極化。你和他們的關係怎麼樣？

答：基什內爾打電話恭賀我，可是福克斯沒有，北美洲政府大使館也沒有。但是我不會抱怨，他們有權打電話給我或者不打，無論如何，我們尊重所有政府以及其政策，不會插手干預別國的內政。

我們擁有世界各地社會運動界的盟友，包括美國的社運界。我們會繼續尋找那些在鬥爭中能夠給予意見和指引的盟友，我仍然需要從玻利維亞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身上好好學習。

問：基羅加(Jorge Quiroga)〔右翼聯盟社會民主力量黨候選人〕，在選舉中以28%的選票排名第二，他矢志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TLC)。另一方面，爭取社會主義黨對自由貿易協議的態度很含糊，反而對地區整合的計劃感興趣。自由貿易協議和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會怎麼樣？現在玻利維亞的身份是准會員國。

答：無論甚麼商業條約，我們所談及的自由貿易協議、美洲自由貿易區，或者其他也好，一定要達致公正、平等的貿易，那就是小生意、小生產者，以至農糧工業，都解決自身的困難，避免有些國家大量補貼農產品，然後出口傾銷到別國去。我相信這是問題的核心。因此，我們必須修改這些條例，保障小農、小工業有市場。也許我們也能夠打進北美市場，誰知道呢！也許靠古柯啊（大笑）。如果我們土著的農作物昆諾阿莧或者喇嘛肉(lama)有市場，我們也會簽署，但是，我們不會簽署那些趕盡殺絕小生產者的協議。

註釋：

(1) Herve do Altot 是第四國際法國支部機關報《紅色》(Rouge)駐玻利維亞的記者。

〔譯自《國際觀點》，2006年1月號，總第374號〕

玻利瓦爾革命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可能嗎？

Rolf Bergkvist著 Linn Hjort英譯 兆立中譯

〔譯者按：本人曾於3年前譯出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關於委內瑞拉的局勢》一文（刊於《十月評論》第30卷第2期〔總第213期，2003年8月15日出版〕）。《先驅》2004年秋季號（總第73期）刊登了署名陳泰的《前路茫茫後有追兵——八·一五公決後的委內瑞拉工農運動》一文，提出批評：「『第四國際』認定『委內瑞拉的工人、學生、有階級意識的工會和人民團體、玻利瓦爾的左派圈子和左派政黨的鬥爭……是一個爭取主權、爭取人民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的鬥爭』，對無產階級革命和工人政權的必要性現實性隻字不提。有些組織雖認同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卻回避對查氏政權的階級定性和工人階級如何對待該政權的政治立場說明……。」以後，譯者譯出第四國際在2005年3月發表的《關於委內瑞拉的決議》（刊於《十月評論》總219期）。針對《先驅》有關文章，現再譯出以下一文，供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對照參看。〕

社會改革，群眾化的組織，在北邊野心勃勃的超級大國：委內瑞拉社會正處在驚人的變化之中。但是，隱藏在雨果·查韋斯關於新世紀的社會主義的言論的背後，現實情況和社會機制是屬於哪一種呢？委內瑞拉向哪裏走？

在今日的委內瑞拉，真的可能向社會主義過渡嗎？在目前這個時期，美國政府可以公開誣蔑某某國家藏有“巨大殺傷力武器”，然後運用軍事力量開戰，並且佔領別人的國土，這樣的問題似乎有點不大現實。但是，提出這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倒不是像表面看起來的那麼奇怪呢！

委內瑞拉總統雨果·查韋斯在2005年五一勞動節的長篇演說中宣佈：“要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達到我們的目標是不可能的，要找到一條中間道路也是不可能的。……我現在請求全體委內瑞拉人民在新世紀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必須為二十一世紀建立新的社會主義。”

在這裏，請求的人不是學術界人士或理論系統建立者，而是走到革命進程前線的人物。這一段話並不是在勞動階級的紀念日所使用的暫時的措辭，而是反映查韋斯去年幾篇演說中已然很清楚的政治激進立場。

查韋斯已在去年八、九月——在贏取了人民繼續信任他擔任總統的全民投票之後——就開始指出現在必須“在革命中進行革命”。他在好幾篇演說中猛烈攻擊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不人道的制度。他在今年開始強調有必要為新世紀“發明”新社會主義。

也許應該被指出的是，為了使這個對比更清楚，同一查韋斯，在1998年的總統選舉之後，堅定地主張他要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採取“中間道路”。現在，他要的道路卻是“玻利瓦爾革命”，並不是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的中間道路。

進展

政府到目前為止的成就，詳細情況暫且不說，只是簡要列舉以下幾點：

- （一）發動土地改革運動，將未開墾的土地重新分配給貧農和農業工人。
- （二）完成掃除文盲運動，使一百五十萬人民學會唸字和寫字。
- （三）讓窮苦兒童接受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
- （四）開展全面的技能發展計劃以減少失業。
- （五）在最貧困的社區建立300個初級保健護理中心，提供免費保健服務。
- （六）對160種主要食糧和60種家庭必需品實施價格管制。
- （七）建立超級市場連鎖店，食物的價格獲得政府很多補貼。
- （八）在最窮苦的社區設立施食處，免費或以低價供應食物。
- （九）停止所有將本國石油工業私有化的計劃。
- （十）開辦新銀行，向小公司、工人和婦女的合作社提供低息貸款。
- （十一）引進拉丁美洲另類計劃，代替美國大公司要設立的自由貿易區。

這些改革措施的明顯結果就是對民主的信念大為提高了。根據智利公司Latino Barometer去年夏天的調查指出，整個拉丁美洲對“民主”的支持已經降低，自從1996

年以來，已經降落了8%，整個大陸的平均數則跌至53%。

調查中唯一例外是委內瑞拉。委內瑞拉人民對民主的信任已經增加12%，達到74%。這些數字也被1998年以來參加選舉的人數增加所證實。1999年4月的全民投票（議決是否建立立憲會議），委內瑞拉39%人口投了票。2004年8月的全民投票，議決確認或終止查韋斯的總統職位，75%人口投了票——委內瑞拉投票的歷史上最高數字之一。

另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民間組織相當大的增長。很多民間組織是在最近五年中因為開創的社會改革而興起的。免費的保健護理中心是由1萬2千位古巴醫生提供服務，這是國家資助的，但管理則由社區所選出的地方保健委員會來負責。

教育改革已經大大發展到現存教育部門以外，有自願者擔任各個程度（從識字運動到中學及大學程度）的教學工作，包括在極大程度上集體“自籌學費”的團體。設立施食處，為窮人中最窮的人每天提供一餐或兩餐飯，食物由政府資助，但是由社區的婦女來管理。

窮人房屋和建築物的擁有權的文件的分配，已經與社區中不同種類的組織連繫。在這種組織發展得最好的地區，已經能夠把貧民區非常普遍的罪惡幫派清除出去。與這種房屋組織發展起來的同時，一種更政治化的組織也發展起來了。在8月全民公決之前幾個月，120萬人積極參加了為著使查韋斯再度當選而成立的助選團。在一個只有2500萬人口的國家中，120萬名政治活躍份子是個很大的數目。

新工會組織

除了社區組織以外，一個新的全國工會組織UNT（委內瑞拉全國總工會）也創立了。UNT於2003年8月成立，目的主要是對抗舊的總工會CTV，因為第一，CTV支持2002年4月失敗的政變；第二，CTV支持同樣失敗的、國有石油公司在2002年12月至2003年1月的關廠行動。

幾十年來，CTV的領導層一直與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民主行動黨有關連。在以上的兩個情況中，CTV的領導層都與最大的僱主組織Fedecamaras合作，企圖以議會之外的方法把查韋斯免職。對許多工人而言，這是必須組織一個新的民主工會組織的最後證據。經過了僅僅兩年的努力，UNT已贏取了比CTV更多的會員。根據UNT領導人，在2005年春天會員人數約有60萬會員，而CTV則只有30萬會員。這些數字當然不是很確實；CTV的代表可能會提出不同的數字。

一個比較客觀的尺度能夠衡量這兩個工會的相對力量，是各自所簽的協議的數目。在2003—2004期間，76.5%的集體協議是與UNT簽訂，只有20.2%是與CTV簽訂。這主要是由於UNT在公共部門佔優勢。但即使在私有部

門，50.3%的協議是與UNT簽訂，45.2%是與CTV簽訂。

從數字上看，工會組織的人數還沒有達到我上面描述的參與改革的人數，原因是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大多數人民都沒有在私有或國有公司中有固定的工作。大多數工人階級在所謂非正規的部門謀生糊口。儘管如此，這是工作場所的組織，也許會扮演給整個運動注入革命動力的角色。我在下面將會再談這一點。

可是資本主義還在

上面所提到的社會改革對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衝擊。例如，僅僅去年，有人計算，全國2500萬人口中大約有一半的人接受了不同形式的教育。

這些改革還沒有改變社會的結構。委內瑞拉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大多數主要的生產手段是被一小群國內外的業主所控制的。部份重工業部門，幾乎所有的大眾傳播媒介以及整個金融部門，都是由這個階級擁有的。

資產階級對經濟的核心部份行使權力或者——像在國有公司的情况——間接地通過腐敗的公務員。這意味著一切已經發動的社會變革都有被搞垮的危險。當新近成立的合作社在市場上遇到競爭的時候，就會有生存的困難。

如果合作社要繼續生存，就必須脫離原有的市場，獨立生產自己的貨品與服務，連繫新的民主結構，滿足大多數人民的真正社會需要。

為保健中心、學校和日間托管中心提供資金，久而久之會與銀行制度的所有制發生公開的衝突。即使大部份資金由國有石油公司的利潤來支持，但錢還是不夠。2004年政府的支出比上一年增加47%，為了彌補支出，政府以高息向私人銀行貸款。

事實上，過去四年政府不斷欠著委內瑞拉銀行的債項。單是2004年，私人銀行的利潤是13.8億美元——比上年多了一點——這利潤主要來自國家的債項和政府所發行的以美元為單位的公債的交易（這是政府幾年前建立的貨幣管制的一個合法的漏洞。）

這意味著銀行老闆繼續收到巨額收入，也意味著他們可能繼續利用這筆錢在政治局勢有困難時破壞改革的政策。

查韋斯已經開辦新公司來避免這個問題。婦女銀行Banmujer已經向新的婦女合作社提供低息貸款、性別教育和經濟建議。很多新的國有銀行也做同樣的事情。

新開的國有超級市場連鎖MERCAL，在大約一年之內便佔據基本食物市場35%至40%。這個連鎖店獲得政府補貼，降低食物價格。為了打破私人電視頻道對新聞報導的壟斷，政府設立國營電視頻道Telesur，以整個南美洲為對象。

暫時廣傳像查韋斯那樣對待基本的權力問題，也是無可厚非。當工人階級缺乏自己的強大組織，缺乏政治覺悟，即相信通過集體的、以階級為基礎的行動（像1998年委內瑞拉那樣），在結構上改變社會，那麼，革命性的政府也許需要“購買時間”〔意指用拖延手法來爭取時間〕來達到這些主觀情況。

但是，用那個方法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如果有甚麼事情一再被拉丁美洲的二十世紀歷史所證實，那正是這一點：若果改革要永垂不朽，那麼，巨大的土地財產、最重要的工業和整個金融部門必須從現有的階級所有制中解放出來，放置在社會所有制之下。

在所有類似的社會改革已經開始的國家——有時比委內瑞拉更激進——都被資產階級社會阻止和粉碎（例如1930年代卡地納斯統治的墨西哥，1940年代庇隆統治的阿根廷，玻利維亞在1952年革命以後的時期等等）。

這個規則的唯一例外是古巴。古巴的改革，保證永遠都提供保健服務、免費教育和日間托兒服務，唯一原因是將生產手段社會化。在這個意義上，查韋斯完全是正確的；要使改革長存，就沒有中間的道路。現在的問題是：前途到底是甚麼樣子呢？

“沒有工人的管制，就不會有革命”

UNT五一勞動節遊行的主要口號是“工人對國家和（私人）公司的共同管理和控制”。五一前幾個星期，UNT提出了新的法律草案，要求“工人在工廠中有共同管理權”。

UNT希望議會通過這條法律，規定國有公司的管理部門直接選出工人代表，而且鼓勵私營公司採用這個辦法。這法案反映工人階級過去六個月所取得的勝利，以及在鬥爭中獲得新的經驗和討論。

委內瑞拉最大的造紙廠Venepal的工人在一月底獲得重大的勝利。經過好幾年的鬥爭、屢屢發生的佔領工廠，以及全國要求充公的運動，這個造紙廠終於被收歸國有。查韋斯總統在——包括保守的反對派在內的——議會決定這個做法是“為了社會的利益”的第二天，就簽了國有化的決定。

幾乎緊接著這個勝利，私有公司CNV的一群工人經過一段時期的停頓之後，重新發起對這個公司的佔領，要求國有化和工人管制。CNV替國有石油公司PDVSA生產高壓通風設備，而且——像Venepal那樣——已被業主宣佈破產。議會重新正式宣佈沒收該公司是“為了社會的利益”，CNV在四月底被收歸國有。

其實早在2002年底石油公司PDVSA的“關廠”事件中，已經有人提出“共同管理”或者“工人管制”的問題。為了對付管理層使用關廠的行動（來創造經濟危機

以逼使查韋斯辭職），一群群工人試圖保存工廠繼續生產。

當時關廠行動失敗以後，最激進的工人以“工人管制”的口號作為防止管理層破壞行動的唯一有效辦法。但是，事實上，幾乎一點成果都沒有。今天，工會領袖解釋，當時由於工人組織有弱點，加上不理解“工人管制”口號在實際情況的意義，所以失去了機會。

儘管幾家私人公司在2003年夏天被佔領了，儘管公開跟資本家進行鬥爭的工人團體之間有著協調，這個鬥爭並沒有導至巨大的成功。這些佔領工廠的事件——除了Venepal——便逐漸銷聲匿跡。

Venepal造紙廠工人的勝利也激勵了其他國有公司的工人們振奮起來。三月和四月的時候，鋁公司Alcasa和電力公司Cadafe的工人選出了新的管理部門。

在2005年四月，工人之間的討論和所採取的實際行動做得最好的似乎就在於這兩家公司。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激進的工會領袖並不代表整個工會運動。簡短陳述他們目前的想法，也許會使工人覺得有興趣的。

三月底智利記者Marta Harnecker訪問Alcasa鋁公司的工會領袖（當時工人剛選出新管理部門）。該工會主席Trino Silva對公司的工人管制提出三項重要原則：（1）選任管理部門的工人繼續收到與過去一樣的薪水；（2）國有公司並不屬於該廠的工人而是全體人民的財產；（3）因此，“有組織的社會”必須選出代表參加管理部門。

四月中舉行的國際團結會議上，這兩家公司的好幾位工會領袖都參加，電力公司Cadafe工會領袖Joaquim Osorio解釋說，他們並不奮力爭取西班牙、德國和阿根廷的工會那種“共同決定權”，因為一般說來，“共同決定權”“試圖使工會領袖同化以及融入資本主義公司的機制”。

“我們可以從這些模式中學到東西，但是我們要發展的東西是全新的模式，將會在另一個社會結構中運作。這個東西我們在Cadafe稱之為玻利瓦爾社會主義，既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我們工人也擁有權力”。

Venepal 紙廠工人似乎選擇有別於這種激進看法的行動。一月份的國有化之後，紙廠工人認為“現在工人已經控制工廠，所以工會沒必要存在”，因此把工會取消了。其他工廠的工會積極份子已經公開批評這個決定，而且表示關切那種明顯潛伏在背後的狹隘的公司視野。

即使UNT作為全國組織，使用工人在公司中有共同決定權這個口號，這並不意味大家對這個口號的意義有統一的觀點，或者有共同的長期看法。不同派系的工會以不同方法詮釋這口號。

資產階級國家機制

資本家階級繼續對委內瑞拉的經濟有控制權，意味著資本家階級統治國家機制。在這個資產階級國家背後的“商業觀念”（business idea）是保證物質價值繼續向資本家轉移。

國家機制在總體上表達了現存的階級社會，因此，永遠不能夠“被教育”或者“被改革為”其他東西。前面所說可以用更簡單、更清晰的方式來表示。實際上在國家機制的30萬名公務員中，絕大多數人完全反對查韋斯發動的革命。這個資產階級官僚體制中有些人試圖盡全力破壞社會改革，其他人則被動地阻礙民主的決定。

為了舉例說明這些“國家指揮的”破壞行動，提一提以下就足夠了：2002-2003年的國有石油公司PPVSA的關廠事件，是由高層管理部門和公務員以及CTV工會組織的官僚合謀，即國家最重要的管理機構負責計劃，而公務員則負責具體的組織活動。

更驚人的是以下的事實：先前的改革是真正在資產階級國家之外實現的，掃除文盲運動、教育改革、保健所等社會改革，都因為創立新法例、相應的機構，以及靠古巴的醫生、牙醫、護士和教師的幫助，才能實現。沒有古巴的實際支持，委內瑞拉決不可能實現這些社會改革。

要“解決”這個阻擋去路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制，最簡單的辦法是讓全部80萬公務員都退休（或者直言不諱，解僱）。這樣做的小缺點當然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石油公司關廠行動以後，PDSVA至少有一萬八千名經理和公務員被解僱。儘管如此，這家公司大體上依然腐敗。其他國有公司的情況也一樣。要解決這個問題，唯一辦法是現存的機制被由下而上的、截然不同的管理制度代替。

人民的權力

從工人控制生產所得的經驗以及相關問題的討論，是擴大民主制度和在全國層面上促進另類的人民力量調配的主要關鍵。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為工作間的民主組織（管制委員會、工人議會、工會的大型集會）與因應改革而出現的、以社區為主的、自發的組織之間，建立良好的聯繫。

為了使社會改革延續下去，當前的公司管理層（國有和私有）和以資產階級為主的國家的公務員，必須由民主管制組織與全由工人怎麼樣使用資源的計劃所替代。

因此，僅僅在公司層面或者有限的本土社區組織要求共同管理權是不夠的。直接的民主組織將會為權力機構奠定基礎，社會所有階層的代表都被選任和可被罷免——從工作間的本地管制委員會到國家的總統都包括在

內。

去年秋天的全民投票，有60%投票給查韋斯繼續留任——即使產生於資產階級的民主架構——那次成為很好的、具有教育意義的典範：罷免任何人都是可能的一一無一例外！在今天的拉丁美洲，沒有一個新自由主義政府準備像委內瑞拉那樣的全民投票，反而被人民起義推翻，比如厄瓜多爾、玻利維亞、阿根廷、秘魯、巴拉圭……

建立必須的聯繫的主要阻礙是運動內的官僚體制。去年，查韋斯的政黨內有基層公開批評上層的領導。再者，即使查韋斯認真處理至少一部份的批評，可能陸續有反對這一官僚層的鬥爭。

死亡威脅與生存的可能性

查韋斯唯一能夠充分調動國家是軍隊。四個服務單位的士兵和官員都積極參加掃除文盲運動，他們負責運動的後勤工作，並且以個人身份擔當教育者。軍用車輛經常運輸食物給MERCAL店，在一些罪案頻頻發生的貧民區，士兵保證了周圍附近的安全。

兵團開設課程給成人和兒童。2004年11月，我參觀加拉加斯最大的兵團Forte Tiuna，與Rafael Angel Studro中校同行，我駕車一個多小時，穿梭於新的教育中心，在那大片的土地上開辦了不同的課程：種菜、養豬、養雞的農村合作社，餐飲服務的婦女合作社等。

由以前當傘兵的查韋斯下令軍隊“對貧窮開戰”的例子多不勝數，這樣至少意味軍隊與附近的貧民區之間那道傳統的圍牆已經被推倒。

軍隊和社區融合，解釋了為甚麼至今大部份的士兵和在操作層面的指揮官仍然對查韋斯忠心耿耿。軍隊大部份從中下階層或者貧窮家庭招募士兵，2002年的軍事政變，只有少數的高級軍官參加，相反有成千上萬來自貧民區的平民重新建立民主體制。

參加政變的軍官手裏完全沒有軍隊，但這並不使軍隊避開貪污，或者阻止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政府企圖為已發動的軍事侵略作串謀，去年年底發生的一個例子說明這一點。

12月中，FARC代表Rodrigo Granda Escobar 在加拉加斯被綁架。他被帶到邊境及移交哥倫比亞警察。綁架事件是委內瑞拉警察做的，他們被大量美金收買去幹非法勾當。如果有人不認為美國情報機關積極尋找類似的貪污的人，藉以滲透軍隊，那就太天真了。

結論只能是窮人必須組織起來，在軍事上保衛剛剛取得勝利的改革。面對美國政府越來越強烈的口頭威脅，查韋斯於2005年推行新軍事策略，保衛國家，避免被侵襲，除了傳統的軍事體制，民間保衛隊也組織起來。

“民間保衛隊”（Unidades Populares de Defensa, UPD）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組織十萬至十五萬名武裝的、受過軍訓的男女。他們的基地是工作間或者社區，每一隊伍有50至500人。萬一遇到侵襲，他們不必依賴常規軍隊，便能夠展開持久的游擊戰，對付侵略者——即軍事術語的“不對稱的戰爭”。

美國的計劃

到目前為止，美國企圖推翻查韋斯，不論是否用武力，均告失敗。結果是委內瑞拉國內結盟的資產階級的勢力大大被削弱。美國支持2002年4月失敗的政變，導致數以百計的、支持美國的官員被辭退。另外，在石油公司PDSVA，大約18000名的經理和高級職員因為支持失敗的關廠事件而被辭退。

美國給錢煽動，卻導致2004年8月15日的全民投票，重重打敗資產階級反對派（還有打擊那些憎恨查韋斯的中產階級的選民的士氣），但卻掀動最大的政治動員，捍衛革命。

這些反擊使革命進程更加激進，同時也幾乎消滅任何對付查韋斯的保守派。全民投票之後，加上10月底州長選舉失敗，便再沒有任何政治保守派。

根據最近的民意調查，當今的查韋斯是目前全拉丁美洲最受人民愛戴的總統，這是唯一顯示政治權力關係的表現。

這就是為甚麼布殊政權自從2005年初，比較明顯地開始轉用“從外面”攻擊的軍事策略，與Alvaro Uribe統治的哥倫比亞獨裁政權合作。為了這次軍事干預，雙方早已開始準備。美國和哥倫比亞在2005年初，大大加強他們在委內瑞拉邊境的軍事基地。

邊界侵犯作為“試驗”，定期發生，以測試委內瑞拉防衛的準備程度。那些“試驗”由哥倫比亞正規軍和輔助軍實行。2004年，委內瑞拉有6名駐邊境士兵被殺。2005年5月，逾100名哥倫比亞輔助軍在加拉加斯的地區被逮住，他們在那裏正在準備策動軍事恐怖活動。

最近幾年，美國政府為哥倫比亞提供三千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增加三倍的軍隊數目（超過275 000名士兵），特別增加空軍的軍火（主要是直昇機和戰鬥飛機），提供先進的軍事技術和幾千名軍事顧問（軍官及“僱用”的專家）。美國也在厄瓜多爾、秘魯和多明尼加共和國建立新的軍事基地，還有，過去幾個月，在委內瑞拉海岸線以外舉行海軍行動。

有計劃地挑釁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爆發邊界事件，乃美國軍事干預的最佳時機。這種事件能夠升級至武裝衝突，讓美國介入，“保衛”哥倫比亞，美國的技倆包括空襲、從停駐海岸線以外的戰艦上發炮，特種部隊上

岸刺殺委內瑞拉政府和群眾運動裏面的重要人物，以及由被滲入的輔助軍策動起義，背後的支持者有國際大眾傳媒、金融銀行家和石油公司經理。

可是就像佔領伊拉克那樣，最終比布殊政府想像的還要昂貴和危險，在軍事上攻擊委內瑞拉將會遇上幾道難題而失敗。儘管過去三年，哥倫比亞農村爆發激烈的恐怖事件，Uribe政府都無法消滅FARC或者ELN游擊隊。對哥倫比亞政府來說，在這樣的情況下開闢兩個戰場，不會沒有困難的。在邊境集結的軍隊，為政治—軍事的游擊隊組織打開新的地理局勢，重新攻擊大城市裏的軍事和警察目標。

再加上政治的激進化，委內瑞拉的革命進程激發哥倫比亞數以百萬的窮人組織起來，也許使美國支持的Uribe政權陷入死胡同，除了哥倫比亞的極權政府，沒有南美洲的國家願意派一名士兵參加美國主導的、對委內瑞拉的攻擊。

同時，美國在這個時候策動大規模侵襲的機會很低。美國十五萬名士兵深陷於其佔領的伊拉克，加上新戰場優先選在伊朗／敘利亞一帶，所以美國軍事干預只會限於空襲、海軍發炮和派遣特種部隊。就像反對攻打伊拉克那樣，軍事侵略將會立即促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武裝起來保衛國土。

捍衛進行的社會改革，與保衛薩達姆的獨裁政權完全不一樣。

另外，由於捍衛社會改革的階級特色，升級的軍事侵略或會激化革命更進一步：支持美國軍事干預的國內資本家階級那種反革命的立場，可能立即使他們的公司或者財產充公。

這完全有可能與早期的古巴革命相似；為了捍衛反對美國侵略的民主革命，古巴領袖推行經濟社會化，以及將當權的階級的財產充公。

在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會意味對玻利瓦爾革命構成死亡的威脅，也長遠地威脅古巴革命的存活。雖然加重整個拉丁美洲不穩定的政治局勢，但卻削弱支持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政府，而且煽起反帝國主義的新浪潮。

這個死亡威脅一定要認真對待，但卻不容許其壓倒那民主的玻利瓦爾革命可能發展為這個世紀的第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活生生的可能性。絕對沒有歷史定律能夠躲避這種發展的。

（譯自《國際觀點》第369期，2005年7/8月號）

Rolf Bergkvist是瑞典的拉丁美洲分析員，也是“無國界社會主義”的成員。

薩巴達主義革命份子的政治轉變：向前走了一步

赫爾斯著 兆立譯

〔譯者按：本文作者赫爾斯(Phil Hearse)在“以奪取政權來改變世界”〔見《十月評論》第218期(2005年4月30日出版)〕一文中擺出，墨西哥薩巴達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的副指揮官馬科斯在一九九〇年代的一次宣告中宣佈，薩巴達主義者拒絕為取得國家權力而戰鬥。現在作者在本文中告訴我們，薩巴達主義革命份子對政權這個問題有了正面的轉變。〕

薩巴達主義民族解放軍〔以下簡稱薩解軍〕在〔二〇〇五年〕6月中在〔墨西哥〕奇阿帕斯所發放的緊急警報，在拉丁美洲及其以外的左派和社會運動中間都響起了警鐘。結果，這個緊急警報卻是一個預防的安全措施，因為在那個時候領導這個運動的秘密委員會正召集軍隊，它的政治幹部／奇阿帕斯自治區政府的領導人等來作一次‘協商’(Consulta)——事實上是整個運動的代表大會——來討論一個重大的政治轉變。

這個代表大會以極大多數的／票數通過了‘從拉孔多納熱帶雨林中發出的第六次宣言’。這個宣言引發這個運動走上一條試圖與墨西哥和國際上其他左派團體和全球正義運動團結一致的新道路。為了達到那個目的，薩解軍計劃派出一個代表團到墨西哥各地／進行包含多種討論題材的對話，其目的是試圖建立一個運動“為左派的綱領和新憲法而奮鬥。”

薩解軍這個新轉變的原因是什麼？它的各種建議的意義是什麼？尤其是最重要的，這個轉變是為／要使薩巴達運動脫離引致它陷入僵局的政治孤立而設計的。為了更好地瞭解那一點，我們必須回顧一下過去七年中這個運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九九七年的五月至七月間，薩巴達轄區的平民社區遭受了許多次攻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隊與正規軍有聯繫的武裝份子襲擊薩巴達同情者所聚居的埃／克塔索鎮。

四五名手無寸鐵的平民被屠殺。9位受害者是男人，21位是婦女，15位是兒童。關於這次屠殺的發／部份是，它是由陸軍從當地招募來的兵士所執行的。墨西哥政府以埃克塔索的屠殺案為藉口，加強了奇阿帕斯地區的軍事化，一九九八年的4月11日和5月1日，墨西哥政府派軍隊去強暴地解散38個薩巴達自治區中的二個自治區。事後，奇阿帕斯長官Roberto Albores Guillen聲明：“我會剷平整個自治區的叛亂”。

薩解軍因為在熱帶雨林深處不能夠多時趕到各個樹落來阻止幾十起的謀殺、強姦、毒打、毀壞作物／和偷竊農民的錢財的事件的發生。

政治反攻

經過一段寂靜時期以後，薩解軍在一九九九年發出一個訊號要打敗軍事攻擊的政治反攻訊號：副指揮官馬科斯發表他的著名的文章‘偽裝與靜默’，要求墨西哥左派和‘平民社會’保衛薩巴達主義革命份子。薩解軍發起了一個全國性運動，到全國各地派出了一千多名薩巴達革命份子要求為基本的社會改革的問題進行一次全民投票。

馬科斯本人到墨西哥市去向群眾發表演說。這似乎為與在二〇〇〇年當選的既將上任的右翼國民行動黨[1]政府和總統福克斯(Vicente Fox)進行新的對話提供了條件。

雖福克斯然在競選時作了很多諾言，他上台後拒絕實現聖安德列亞斯和議的條款，因為這個和議允諾薩巴達社區可有自治權和擁有土地權。各村莊仍然被軍事化了的整個地區所包圍，而與當局的衝突時常發生。奇阿帕斯山區的有些社區對制度革命黨[2]又忠誠。他們成為議會中的右翼的支持基礎。所以，這些社區本身就是時常對薩巴達各社區進行騷擾的來源之一。

由於福克斯政府拒絕談判，薩巴達主義革命份子們“空手而回”。薩解軍領導層對政治上的突破絕望了因此決定把精力集中在政治——軍事的重組和改善薩巴達基地社區人民的生活上。

自治區政府

薩解軍領導層已試圖把決定權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去，鼓勵各自治區的政府和優良的政務會來取得決策權。據馬科斯說，在過去幾年中，他也參與了培養新一代政治幹部的工作。

自我組織和平等主義原則，再加上墨西哥和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相當大的努力，其中一些非政府組織在當地派有永久的工作人員。他們已經對地區人民的教育、健康和營養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改進。

這種社會和政治上的進步，當然並沒達到解決奇阿帕斯原住民的基本問題的程度。這些基本問題的根

源在於整個墨西哥人民的貧窮和缺乏民主，雖然從歷史上來看，這些事件對於受到雙重、三重剝削的原住民社區的打擊特別重。

薩巴達陣線

事實上，薩巴達運動早已認識到，它的目標只能在整個墨西哥的平面上實現，而且薩解軍的鬥爭是國際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鬥爭的一部份。可是，馬科斯和薩解軍領導層對重組後，統一起來的墨西哥左派的態度卻是非常混雜的，如果大體上說來不是負面的話。

一九九五年薩巴達主義革命份子帶頭組成全國性的薩巴達陣線(全／薩巴達民族解放陣線)。這個組織迅速地吸引了許多左組織和左派份子。這很可能變成新的、廣大的左派政黨的基石。但是，最後，薩解軍領導層否決了這個發展。

馬科斯在一封關於第六次宣言的信中暗示說，這是因為薩解軍已向它的基地社區許下諾言，這個運動永遠是原住民的、為原住民服務的運動，並不是一個比較廣大一點、可能不把它焦點集中在他們的需要和要求上的東西。有些評論員說，馬科斯帕失去了對這個運動的控制。

不管理由是什麼，拒絕把薩巴達陣線轉變為一個廣大左派政黨式的構成物，就為它之成為一個有效的政治力量敲響了喪鐘。它以“薩巴達團結運動”的形式殘存，但是已沒有什麼會員或影響力了。

墨西哥的平民社會曾經週期性地動員起來保衛薩巴達革命份子，但是它不需要薩巴達陣線來做此工作。恰恰相反，左派的積極份子和同情者在基本上像往常一樣將是對提出一個全面、或多或少前後一致的另類全球政治路線的政治組織忠誠。

全墨西哥的政治領導層？

有人爭辯說，提供全墨西哥範圍的左派政治領導層不是薩巴達主義革命份子的責任，因為後者不管怎樣將會發現從這個國家的小小的、孤立的角落提供這樣一個領導層是非常困難的。龔薩勒斯(Jaime Gonzalez)在一九九九年的一次訪談中提到薩巴達主人革命份子的時候說：

“現在我要問的是，這個廣得人望的運動怎麼會不能夠支撐更廣泛的政治主動？依我的意思，這個答案非常簡單：他們沒有一個明顯的、取待勝利的戰略。他們不知通怎樣利用選舉，他們一點都不懂得替墨西哥其餘部份製訂出一個綱領。讓我說一句，那不是他們的責任。一個在墨西哥南部一個角落裏發生的原住民起義怎麼能夠製訂出一個適合於整個墨西哥社會的競選綱領？製訂出一個適合於北部的人民、適合於整個

經濟、適合於反對資本主義的過渡綱領？你也可以這樣說：薩巴達主義革命份子提出了他們自己先天地無法解決的問題。

龔薩勒斯的批評包含了一點點自我矛盾。如果薩巴達運動是這麼廣得人望的，他們至少在書其他人合作的情況下就有潛力開始向墨西哥左派提供全部政治領導，如果他們有決心、有政治智慧(‘綱領’以及明智的、統一的策略)的話。

在一九九八一二〇〇〇期間，薩解軍扮演了一個非常主動的政治角色。這是它的反政府的政治反攻的一部份。它對墨西哥市(有十萬學生)的巨型大學UNAM的學生們反對政府向他們強徵學費罷課行動歇盡全力地提供政治支持。甚至當學生們的極左領導層明顯地領導他們走向失敗的時候，也不放棄對罷課的學生們作出百分之百的支持。

除此之外，戴面罩的薩巴達革命份子首次在墨西哥市參加了電力工人工會所發動的，要打敗私有化的示威遊行，而且參加了一九九九年五一勞動節遊行。這些主動的行動似乎顯示出一種開始扮演更廣大的政治角色的熱心，但是在福克斯政府不能夠延續由聖安德列亞斯協議所開啓的和平過程之後，這些主動的行動就沒有繼續下去了。

民主革命黨所設的障礙

在墨西哥目前的情況下，建立一個新的，廣闊的反資本主義政黨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墨西哥的左翼完全由中間偏左的民主革命黨所佔領。民主革命黨本來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從制度革命黨中分裂出來的。由於它吸進了墨西哥共產黨，它的聲勢大增。這個壓力就在一九九〇年代初間接幫忙傾覆了主要的托派組織革命工人黨。

民主革命黨懷念制度革命黨在一九三〇年代、一九四〇年代的舊的民族主義——社團主義的傳說。它是為了反對制度革命黨在前總統沙里納斯的帶領下滑向親美的新自由主義而建立起來的。

但是，在往後幾年中，民主革命黨本身也向右漂移。它的內部一點都沒有類似激進左派組織的跡象。它決不可能代表工人、農民和原住民來進行爭取社會主義或者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只有薩巴達主義革命份子才有民望成為建立另類選擇的推動力。民主革命黨所提供給我們的主要問題——一個非常熟悉的問題——是，雖然它正在向右轉而且最近被牽涉到一體很大的貪污醜聞之中，它卻是可替代有翼的制度革命黨和國民行動黨的唯一可被選民信任的政黨。

它為二〇〇六年的大選所提名的總統候人是極得人望的墨西哥市長洛佩斯·沃勃拉多爾。正因為他得人望，所以制度革命黨和國民行動黨以民主革命黨的貪污醜聞為藉口而企圖使他失去競選人資格。但是這個企圖最後被兩百萬人在首都街頭的靜默抗議遊

行所打三角了。如果不建立另一個可信的選擇，民主革命黨的主宰地位是不能夠被打敗的。

就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可供選擇的左派道路的任务而言，我們應該怎樣評價這個新轉變呢？第六次宣言說：

“我們將要走去聽聽墨西哥人民中簡樸的、地位低下的人們的意見，而且不經過中間人或調解人直接與後者談話。我們將要依據我們所聽到的、所學到的，跟那些像我們那樣的簡樸、地位低下的人民一起着手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鬥爭綱領。這個綱領當然將是左派的或者反資本主義的、或者反新自由主義的、或者是為墨西哥人民爭取正義、民主和自由的綱領。”

“我們也要讓你知道，薩解軍願意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界定他們自己是左派的、不參加選舉的組織和運動，依據以下條件／結成聯盟：

不高高站在上面締結要強加後下面的協定，而要傾聽下面的意見，將下面的義憤組織起來、整理起來。不以私下的談到來提升各種運動，永遠要尊重運動參與人的意見。

在選舉期間不向抓政權的人或者追求權力的人尋求禮物、地位、好處或公共職位。不要試圖從上面來解決我們國家的問題，要從下面而且要為了下面建立一條有別於新自由主義的破壞的道路，為墨西哥建立一條左的通路。

“要相互尊重各組織的權威和獨立性，相互尊重各組織的鬥爭方法。組織方法、內部的決策過程和合法的代表性。要對聯合地、協調地保衛國家主權作出清晰的承諾，要決不妥協地反對電力、石油、水和自然，資源的私有化。”

“換言之，我們正在邀請左派的各個未登記的政治和社會組織、那些認為自己是左派的人們以及那些不屬於任何已註冊的政黨的人們，在我們將要在適當的時間所建議的時間、地點和方式，來組織一個全國性的運動，訪問我們國家的各個可能來到的角落，來傾聽和組織我們的人民。這像一個運動，但是非常有秩序的，因為它不是與選舉有關的。”

政黨、綱領、權力

以上這個宣言中所宣示的東西，包含了許多非常合理的建議，而且向墨西哥左派提供了一個新的、巨大的、令人興奮的機會。即使它的目的明確地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左派的、政黨式的組織，通過對話、聯盟和商議，開始“從下往上”而不是從上面人為地下命令，這種建議，也是明智的。

可是，在馬科斯的談論中，以及在他的主要顧問像前托派領導人Sergio Rodriguez Lascano等人的談論中，對政黨、綱領和戰略的概念，經常有曖昧不清的地方。這與〔他們所說的〕“不以奪取政權來改變世

界”這個問題有關的。就是因為政黨的形式，難道所有的政黨都是／天生地腐敗的、旨在操縱的嗎？參加任何選舉都要僅對，難道左派在原則上必須反對選舉嗎？左派應不應該為着工人、農民和原住民爭取組成他們自己的國民政府呢？

如果薩解軍從下面建立鬥爭聯盟，但是拒絕建立國民政府，拒絕贊同在選舉上從左的方面作出任何挑戰，／就會把主要的政治空間讓給民主革命黨和右派，不能實現它的目的，失去了另一個大機會。這是一個能夠使左派得到復具的政治轉變，否則，它就會完全瓦解了。

一個使人大感興趣的腳注是薩解軍允諾要與全世界左派建立更密切的聯繫，要向全世界富於戰鬥精神的積極份子提供物質援助。例如，宣言說：

“我們也要與婦女的手藝合作社訂一個協議，把很多很多綉製品簿簿送到不支持歐盟的歐洲各地去我們也許也把薩巴達合作社所種植的有機咖啡選。到那些地方去，以致他們可以賣掉而拿到一些錢來支持他們的鬥爭。如果那些東西賣不掉的話，他們自己可以一邊喝這些咖啡、一邊談談如何進行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如果天氣有點冷的話，他們可以用薩巴達的綉製品來蓋他們的身體來保暖，因為這些綉製品可以手洗，洗的時候不會脫線。”

毫無疑問，這個副指揮官還沒有失去他的幽默感！

注釋：

- [1] 國民行動黨是上世紀50年代所組成的一個右翼的新自由主義政黨。
- [2] 名字很精緻的這個制度革命黨七十多年來一直是在墨西哥佔統治地位的政黨，直至在二〇〇〇年的總統選舉中被打敗為止。
- [3] 龔薩勒斯是社會主義者統一同盟的一位領導人。

（譯自《國際觀點》二〇〇五年七、八月份，第369期）

巴西局勢與新左派

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會議決議

蔚然編譯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在 2006 年 2 月召開國際委員會會議，對當前巴西局勢作出如下的決議：

（1）“巴西局勢的發展，證實了 2005 年 2 月間的國際委員會關於盧拉政府及其政策性質的決議。這個決議指出：一個與資本主義的代表結成聯合政府，依靠議會中的右派，……執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金融政策；這樣的政府便無力擔負起解決巴西的社會貧困、社會矛盾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根本問題。”

“去年，盧拉政府所有的計劃和決定都是按照同一個指導原則制訂出來的，那就是：接受金融市場的監督、為償還債務增加預算，不真正進行土地改革[這招來無地農業工人運動（MST）的強烈反對]，沒有減少失業，沒有提高工資，沒有同不平等進行鬥爭。所有這些表明：這個政府是一個真正的社會自由主義的政府（social-liberal government）。 ”

（2）“去年一年，盧拉政府違背人民利益的政策，已由其政治的腐敗給暴露無遺。這表明了它同傳統的資產階級政府沒有甚麼不同。許多國會議員都被收買，成為勞工黨〈1〉和政府的主要成員。政府助理 Jose Diceu 的辭職是一次真正的地震，動搖了勞工黨和巴西的政治生活。”

（3）“盧拉政府的社會經濟、政治和道德情況也證實了我們從這個政府的性質和它的政策得出的政治結論：革命者不能參加社會自由主義的政府。革命者不能參加盧拉政府。這個政府的全部政策是同服從金融市場的強化和反對改革的新自由主義構架相適應的。儘管勞工黨中左翼的大多數，包括勞工黨中的社會主義民主派（DS-PT）〈2〉的同志們，對政治腐敗和勞工黨的運作提出過批評，但在最近一次勞工黨領導的選舉中，都不支持同政府決裂的政策。在過去三年間，新自由主義的程度和範圍越來越嚴重和擴大，貪污腐敗也越來越嚴重和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就應當同政府決裂，但同志們卻拒絕這樣做。”

（4）“2006 年大選期間，盧拉作為總統候選人還會重申他的社會自由主義政策。面對這次總統選舉，革命者一致提出反對資本主義，” “要求同勞工黨領導分子的社會民主主義決裂”，“這無疑是一種進步。” 社會主義與自由黨（The Party of Socialism and Freedom 簡稱 PSOL）〈3〉已經決定提出希露莎·海倫娜（Heloisa Helena）作為這次大選的總統候選人，在這次競選鬥爭中，“她要提出保衛大多數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同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決裂的政治綱領，她要斥責右派的所有攻擊，和金融市場的強制政策，及新自由主義反對改革所造成的所有後果。她對盧拉政府的所作所為表明反對的立場。海倫娜要成為反對帝國主義的總統候選人，要同拉丁美洲人民的鬥爭團結一致，特別要同委內瑞拉人民革命團結一致。這個總統候選人能夠給千百萬巴西人民有機會表達他們抵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進攻和改變形勢的願望。這個總統候選人要超越個別傾向個別組織之上，組成一個聯合的激進的左派；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左派。這樣，在拋棄盧拉這個領導之後，才能執行勞工黨原先的綱領和恢復勞工黨原先的基本價值。”

(5) 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注意到巴西的左派一直處在分立之中。大部分左派組織一直留在勞工黨內。另外的其他組織，如巴西共產黨重組(PC do B)、工人社會主義聯盟(PSTU)都堅持各自的立場。第四國際在巴西的力量不幸地處在分立之中。“爲了促使所有反對資本主義的左派組織的各個組成部分最大限度地有機會繼續討論，國際委員會重申同巴西的第四國際所有各組織保持聯繫，這些組織繼續作爲國際的成員擁有全部權利。”

(6) 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提議“就巴西局勢進行公開討論，特別是對20多年來勞工黨的演變，黨的策略作出評估，還要就國際委員會的討論和決定，進行討論。”

(7) “國際委員會注意到勞工黨中的社會主義民主派(DS)沒有參加2006年2月會議。因此，國際委員會責成政治局在最近可能的將來組織一次會議，以便同社會主義民主派的同志們繼續討論。”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3卷第1期（總第220期）

2006年5月4日出版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46 3428 傳真：3494 1762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 (852) 9846 3428 Fax: (852) 3494 1762
E-mail Address: october_review@yahoo.com
Web Site: <http://www.octreview.org/>

註釋：

<1>巴西勞工黨(The Workers Party of Brazil 簡稱 P.T)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初，是巴西最大的工人階級政黨。現任巴西總統是創始人之一。參加這個政黨的有各種不同傾向的政治派別，其中也有第四國際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如社會主義民主傾向(Socialist Democracy, 簡稱 D.S)，是勞工黨中最主要的革命派。

2002年巴西大選時，盧拉作爲勞工黨的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成功。2003年1月正式就任巴西共和國總統，巴西勞工黨成了巴西的執政黨。

1987年巴西勞工黨第五次全國黨代會曾通過一個革命性的綱領，目的是建立：“民主的人民政府”、“實現真正的、全面地與現存模式決裂，爲可能選擇的發展模式奠定基礎。”

2001年10月巴西勞工黨第十二次全國黨代會爲盧拉競選總統，又通過了名爲《勞工黨爲巴西政府擬定的政治概念和方針路線》。這個《方針路線》基本上堅持了第五次全代會的革命綱領。

但盧拉在2003年1月就任巴西總統後，便一步步地拋開巴西勞工黨原先擬定的革命綱領，越來越屈服於國際資本和本國資產階級的壓力，堅持繼續執行前任總統卡多索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和金融政策。

<2>巴西社會主義民主傾向是巴西勞工黨中的一個派別（簡稱 DS），是第四國際在巴西的一個組織。海倫娜是創立人之一。她也是巴西勞工黨的創建人之一。現是巴西共和國的國會議員。

<3>社會主義與自由黨(The Party of Socialism and Freedom 簡稱 PSOL)，2003年12月，海倫娜與另外幾位國會議員的同志因爲反對盧拉政府的社會福利改革計劃，遭到了勞工黨的領導集團開除出黨。這引起了勞工黨和巴西政府一次深刻的政治危機。全國各地勞工黨的活動分子對盧拉領導集團違反勞工黨多元化和民主原則的優良傳統極爲不滿，許多人相繼宣佈脫離勞工黨，重新組織新左派政黨。2004年來自巴西各地的700多名左派活動分子齊集首都巴西利亞，召開大會，討論新左派政黨名稱和綱領。新左派政黨定名爲社會主義與自由黨，簡稱 PSOL，在葡萄牙文中即太陽。海倫娜成了新左派政黨的主席，並被提名爲2006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新左派政黨宣稱繼承巴西勞工黨的優良傳統，堅持巴西勞工黨原先的革命綱領，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帝國主義。

THE ROOT OF AGGRAVATING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

Jun Xing

The rampant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led to increasingly acute sufferings by the peopl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meetings in spring, many reports abou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current state policies surfaced. The Premier Wen Jiabao also acknowledged that the issues of health, schooling, housing and security, which are the main concerns of the people, are "still to be better resolved". Indeed, these are the social problems that have shown no signs of alleviation. The primary reason is that health, education and housing are being commodified and have become important means for profit-making.

Health

In a survey, the most profitable business of 2005 was that of the medical system. Hospitals and clinics are reaping huge profits. For example, antibiotics is sold by the pharmaceutical factory at a price of 12 yuan, but sold in the hospital at 170 yuan, with a profit of 13 times. The hospital price is normally tens of times more than market retail prices. Statistics show a high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medical expenses in household expenses. As reported by *Wen Hui Bao*, while peasants' net income since 1980 has increased by about 30 times, and wages of urban workers have increased by about 20 times, the proportion of medical expenses in household expenses have increased by 122 times. Statistics from the Health Ministry indicate that 48.9% of sick people in the country do not see a doctor, as they should do, and 29.6% of the sick who should be hospitalized are not hospitalized. Of the urban poor, 30%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 poor due to illness.

The government's share of medical and health expenses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s 80-90%; in the USA is 45.6%; in Thailand is 56.3%. Yet in China, 44.8%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79.1% of rural population do not enjoy medical insurance, and most people have to shoulder their own medical expenses.ⁱ

There are astounding stories of how hospitals reap huge profits. The CCTV reported on 21 Nov 2005 a case of a cancer patient staying in a hospital in Harbin for 67 days, and billed for 5.5 million yuan. In over 70 % of hospitals in China have occurred disputes between patients and the hospitals about the medical costs. The 2005 report of the State Auditing Department has it that of the 10 hospitals under the Health Ministry and in Beijing randomly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in 2003, over 20 million yuan

excess of medical fees and drugs fees were charged.ⁱⁱ It is reported that of the 9 million blind cases in China, 6 million should have been curable, for example, cataract cases. However, the lack of funds and facilities has resulted in the lack of treatment for the patients.

Education

Another serious problem that has come up in recent years is the tuition fees for tertiary education. Before the Reform of 1979, tertiary education was free. 20 years ago, it was increased to 200 yuan. In 1995, it was 800 yuan. In 2005, it was increased to 5,000 yuan. Hence, within 20 years, the increase was 25 times.ⁱⁱⁱ It is reported that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number about 2.4 million, which is 20% of the student population. Students with seriou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re around 5-10% of the student population. While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education expenses in the GDP in the world was 4.8% in 1998, in China, the proportion has been 2.5%-3.5%. An official from the Education Ministry said that it takes about 400 billion yuan to maintai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 but state input is only 80 billion yuan. The bank loans to the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 have exceeded 100 billion yuan, and the difference has to be made up by tuition fees. Surveys show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rural background have dropped from former 60-70%, to the present 30%.^{iv} It is also reported tha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rural children have a high drop out rate. There is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official figure and those from surveys. The Party Central School conducted a survey in 2004 in 16 provincial cities. For example, the Jiutai Middle School of Bin Xian, Heilongjiang Province, reported of a 2% attrition rate, yet the survey found out that the rate was 8%.^v

To keep operation with an inadequate input from the state funds, schools have resorted to extorting money from the students. Since 2000, excessive educational fees have remained at the top of complaint reports. In 2005, over 13,000 cases of such complaint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nto by the authorities.

Housing and livelihood

One of the nine most profitable businesses in 2005 was the property market. Local authoriti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grabbing land from the peasants or the residents, and the property market prices have soared. At the same time, the poverty situation is still serious. The Director of the State Council Poverty Alleviation Department said that

the annual grain consumption of poor households was a per capita 75 kgs, which is on the subsistence level. Among 592 key count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332 suffer from inadequate food, which involves about 130 million people. China's poor population numbers second in the world, coming after India. There are still 23.65 million people in rural China that have not resolved their food shortage problem, and low income poor population numbers 40.67 million.

While there is still a substantial low income population, with social polarization, the rich in China is also rising. Some statistics show that in 2003, 236,000 people own financial assets of over US\$ 1 million. Their total wealth exceeds US\$ 969 billion. China's GDP in 2003 was US\$ 1,400 billion.^{vi} Less than 0.5% of the households own over 60% of the country's wealth, and about 70% of this 0.5% households hold an asset of over US\$ half a million. For comparison, in the USA, 5% of the population owns 59.2% of the country's wealth.^{vii}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announced by the State Structural Reform Committee, the lowest 20% of urban population owns only 2.75% of the urban income. It amounts to only 4.6% of the income of the top 20% of the urban population.^{viii}

Crime

With social polarization, crimes are becoming rampant, and the sense of 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on the declin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announced by the Beij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n 17 Nov 2005, in January to September 2005, crime cases reported to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all over the country numbered 47.8 million, a rise of over 20%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This means a daily number of 170,000 cases. In March 2006, the report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d it that local criminal courts had completed a total of 683,997 first trial cases, and 844,717 persons were convicted. Completed cases on serious crimes such as explosions, intentional murders, robberies, rapes, kidnaps and mafia numbered 238,738, and criminals convicted numbered 321,395 persons. According to a mafia study specialist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the mafia in China number at least 1 million.^{ix}

While there are more crimes, social polarization has also induced more revolts and protests from the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Blue Paper" published in 2005, the officially named "mass incidents" numbered from 10,000 cases in 1993 to 60,000 cases in 2003,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se incidents increased from around 730,000 to 3.07 million. In 2005, mass incidents increased to 87,000 cases.^x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74,000 mass incidents

occurred in 2004, an increase of over 6 times as compared to 10,000 cases in 1994, with 3.76 million people participating. The causes for the incidents wer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ities, capital-labour relations, acquisition of rural land, urban demolitions and removals,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and compensation for displaced people.

Apart from mass protests and actions, many people have resorted to the spaces in the internet to voice their grievances and discontent. Before the premier Wen Jiabao was to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several official and commercial websites organized cyberspace forums "I have a question for the Premier". According to some statistics, about half a million web visitors posted their views on issues ranging from corruption, health, education, rural issues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xi}

Thus, though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eems spectacular, with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9.5% in the last five years, reaching a per capita GDP of over 13,000 yuan in 2005, a financial revenue of 3,000 billion yuan, and a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 of US dollars 853.7 billion, surpassing Japan to become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daily life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for education, health, housing and livelihood, there is little state input, and the burden weighs o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ithout changing the basic line of marketization and some key policies, the minor funding allocation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or cancellation of rural tariffs cannot be of much help.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for people's lives is not only the wrong policies and lines, but also the political regime. The political system has to be radically transformed in a democratic way in order to bring forward a radical resolution of the burdens on the people. Not the "steady, orderly political reform" advocated by Hu Jintao,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is speech on 21 April 2006!

1 May 2006

ⁱ *Wen Hui Bao*, 20 Jan 2006.

ⁱⁱ *Wen Hui Bao*, 30 March 2006.

ⁱⁱⁱ *Apple Daily*, 18 March 2006.

^{iv} *Ming Pao*, 8 Feb 2006.

^v *Apple Daily*, 16 Dec 2005.

^{vi} *Wen Hui Bao*, 9 March 2006 quoting *China Youth Daily*, 8 March 2006.

^{vii} *Ming Pao*, 15 Dec 2005.

^{viii} *Wen Hui Bao*, 6 Feb 2006.

^{ix} *Apple Daily*, 22 Jan 2006.

^x *Ming Pao*, 10 Feb 2006.

^{xi} *Apple Daily*, 16 March 2006.

目錄

香港	2 嚴禁非法秘密監察 確保市民私隱等權利.....振言
	3 社會民主連線宣言(轉載)
中國	4 中國社會問題日益惡化的禍根.....軍行
	9 打敗帝國主義的反革命運動!——保衛、擴展1949年革命的成果! 支持把斯大林主義官僚攆下台的工人政治革命!.....《工人前鋒報》社論.....兆立譯
國際	18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大會宣言.....蔚然譯
	20 大家都來反對歐盟博克斯坦指令和老板們的進攻! 第四國際歐洲各國支部的聯合聲明.....蔚然譯
	21 國際新聞短波: 第22屆國際革命青年夏令營; 地中海社會論壇中的婦女集會; 蓋洛威就倫敦被炸事件發表的聲明.....兆立輯譯
拉美社會進步特輯	
	22 “將石油、天然氣國有化是我們首項的任務” ——訪問玻利維亞新當選總統埃沃·莫拉萊斯.....赫夫·多·艾濤著.....秋惜譯
	24 玻利瓦爾革命 委內瑞拉: 社會主義可能嗎?.....Rolf Bergkvist著...Linn Hjort英譯...兆立中譯
	29 薩巴達革命份子的政治轉變: 向前走了一步.....兆立譯
	32 巴西局勢與新左派——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會議決議.....蔚然譯
英譯	34 The root of aggravating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Jun Xing

OCTOBER REVIEW VOL.33 ISSUE 1 2006.5.4

Hong Kong

- 2 To ban wiretapping and defend people's privacy rights.....Zhen Yan
- 3 Declaration of Social Democratic Front

China

- 4 The root of aggravating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Jun Xing
- 9 To defeat the imperialist and anti-revolutionary movement!—To defend and enlarge the fruit of the 1949 Revolution
To support the working class politics of expelling the Stalinist bureaucracy.....(tr.) Zhao Li

International

- 18 Declaration of 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 meeting.....(tr.) Weiran
- 20 Another Europe is possible! No to the multinationals' constitution!
Statement of 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tr.) Weiran
- 21 International news: 22nd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Youth Camp; Mediterranean Social Forum: Womens
Assembly meets; and Galloway and Ber inotti statements on London
bombings.....(tr.) Zhao Li

Special Issue on Latin America

- 22 "The nationalisation of hydrocarbons will be our first task"
Interview with Evo Morales.....Herve do Alto.....(tr.) Qiuxi
- 24 Bolivarian revolution, Venezuela: is socialism possible? Rolf Bergkvist..(Eng.tr.)Linn Hjort....(Chin., tr.)Zhao Li
- 29 Zapatista Turn, One Step Forward.....Phil Hearse.....(tr.) Zhao Li
- 32 Res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IC)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on the Brazilian situation (27th February 2005).....(tr.) Weiran

Article in English

- 34 The root of aggravating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Jun Xing